

佳士运动教训备忘录

(2018-19 佳士运动为什么失败及其 27 个重要问题)

——留给将来新的历史阶段的群众斗争先进工人和左翼行动者的一份备忘录

清道工

【佳士运动综述】2018 年 4 月起，深圳佳士科技公司的几名工人积极分子发起了反对资方不合理罚款制度和刁难报复员工行为的斗争，很快在 5 月份积极分子把斗争提升为争取组建企业工会，并征集了 28 名工友联名向坪山区总工会申请，在得到区总工会肯定答复后，佳士建会积极分子在 7 月中争取到 89 名佳士工人签署加入工会意愿表（据上市公司财报，截止 2017 年底，该公司员工总数 1012 人）。然而资方从 5 月就开始陆续开除斗争积极分子，因此发生越来越多冲突，到 7 月中，7 名建会积极分子均被开除，区总工会也转而拒绝佳士工人建会申请。7 月 20 日 7 名已被开除的建会积极分子到佳士厂门口要求复工、组建工会，与厂方人员和赶来的警察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7 名建会积极分子随后被警方带走（工人称警方带走过程中实施了殴打，并留有医院治疗记录）。当天 19 名工友到派出所声援要求放人，同时工友的自媒体和微信群里广传请求全社会关注的呼吁。建会积极分子陆续获释后，又在 7 月 22 日与其他几十名前来声援的

工友齐聚派出所门口抗议警察打人、要求处理打人警察、要求派出所赔偿工人的损失，引发数百路人围观。

之后几天，二三十名佳士工人积极分子和声援工友多次到工厂要求复工、建会、涨薪、改善福利等，试图争取团结更多工友起来斗争，同时多次与警察正面对峙敦促公安机关解决处理打人警察和赔偿损失等问题，并在自媒体和网络群组转发公开信动员征集联名，与工人积极分子密切联系的毛派活动者通过互联网更是动员了全国各地上千人联名声援。深圳坪山警方 7 月 27 日实行大抓捕，数小时内刑拘了 29 人包括佳士建会工人和其他声援工友、学生。

此后毛派声援更加升级，众多资深毛派社会活动家、富有斗争经验的老工人和前新四军老战士在网上号召全国热心网友“赶赴坪山”“赶赴燕子岭派出所”支持佳士工人斗争，在此背景下进厂“融工”的青年积极分子沈梦雨及数名工友 7 月 29 日从广州等地赶赴深圳坪山，组成声援团发起第二轮抗议和声援，要求释放佳士工人。8 月 6 日各地毛派群众齐聚深圳坪山燕子岭派出所附近小广场举行政治抗议集会，佳士运动开始由深圳当地工人为主力的争取建工会斗争，转变为民间泛左翼群众为主力、从全国各地开赴集结深圳坪山进行的政治抗议运动。由于示威者高调的举毛像和频繁向党中央表达忠心、向上恳求放人的态度，最初积极声援的相当部分民间左翼和民间泛自由主义

群体都与这场运动渐行渐远，但自由亚洲电台等海外民运媒体和 BBC 等外媒始终对运动追踪报道。

当局 **8.24** 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第二轮大清场（深圳和北京警方同一天清晨出动数百防暴警察抓捕了 **60~70** 名声援学生和工人、NGO 劳工工作者、社会人士，被捕者多数是赶赴坪山集结声援佳士工人的各重点高校大学生，当天新华社、南方都市报、环球时报、光明日报纷纷发文抨击佳士运动，众多官方媒体跟进转载），之后，被捕学生被“训诫”后很快被强制遣返回各自原籍地。之后佳士运动转变为北京、南京、西北地区等地高校进步社团抗议打击报复声援学生和反对校方刁难社团年审的学生运动，到当年 **11-12** 月这场 **1989** 年之后国内首次成规模的学生运动发展到冲突激化的地步，当局也展开了力度更重、范围更广大的第三次大抓捕，重点针对各地高校左翼社团学生积极分子、深圳坪山“青鹰社”相关积极分子和群众以及在各地串联的佳士建会声援工人，这场抓捕从 **2018** 年 **11** 月持续到 **2019** 年 **1** 月初，抓捕范围涉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长沙等众多城市。

紧接着在 **2019** 年 **1** 月中旬当局集中展开了矛头集中对准被疑与佳士运动有关联的南方工运的第四次大抓捕：先是 **1** 月 **7** 日向深圳市政府上访请愿的 **50** 名湖南尘肺工人被警察强制暴力驱逐，紧接着在 **1** 月 **8** 日有协助尘肺工人维权的“新生代” **1** 名职员被捕，**1** 月中旬到 **3** 月下旬，先后有“新生代”、“新工亿”、“深圳春风”等民间劳工

NGO 组织的 7 名劳工维权人士被捕，相关组织陷于停摆。此时，佳士运动的线下活动只剩下北大马会、西安科大嚶鸣学会等个别社团或少数原社团成员的零星局部活动。佳士运动最后有公开报道的线下活动是 2019 年 4 月底几名原北大马会成员结队到北京亦庄打工体验工人夜班生活、当天就被失踪。此外，从 5 月到 7 月，还有被疑牵连的多名社工、以及多名佳士声援学生和声援工人（合计十余人）被捕。期间，2019 年 5 月底，与最大力声援佳士运动的学者潘毅相关的平台“怀火”发布了佳士运动的“左翼回响专题”，其中有谈论佳士运动失败原因的潘毅长篇访谈，如今回看，可视为佳士运动已经以失败落幕的历史宣告。但迄今为止，仍然有 30~40 名社工和社会活动人士、积极工人处于被捕状态或下落不明状态（具体数量不明，据说其中得以获释的人员被封口、被威逼利诱要求保密，其中至少有十多人至今仍处于被关押中，详见后续资料）。

坦率地说，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像样的总结佳士运动的文件，也鲜有一份认真深入讨论佳士运动主要教训的文件。这直接因为这个运动及相关议论都遭到极权当局高压压制，墙内关注人群早已噤若寒蝉，还因为这场运动的众多积极分子还活跃时，就早已极尽道德绑架之能事压制一切对他们一味冒进倾向的批评，以致这场运动最初赢得的外部热心支持者和同情者到了 2018 年最后几个月时就陆续失望沉默了。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显然重大的斗争事件，这个历史阶段不能不留下一份重要的总结，以供今后新的历史阶段的将来群众斗争中的先进工人和左翼行动者参考。出于这份历史责任感，我们整理了“佳士运动专辑”（合共 2.56G）上传网盘([链接](#))，并根据现有材料整理了一份以问答形式概括佳士运动教训的 6 万字备忘录如下。篇幅虽长，但总共 27 个问答，以简要目录明列如下，读者可依此检索。（**特注：备忘录中所有写明了“有据可查”的，都是指从我们整理的佳士运动资料专辑可以查到相关的引语或截图证据。“专辑”所搜集的资料均标明了来源链接，部分网页已无法打开，但有心读者仍可根据部分资料来源链接追查事件进展**）

这份备忘录尽可能收录所有已知的重要看法，也充分明确表明自己看法，并对各方看法做出回应。这份备忘录无意在当下掀起论战，就算引起反驳也不再打算回应，本备忘录已经尽可能充分表达了看法，不过如果至今仍然能激起一些争鸣、或有确实甄别澄清了事实的勘误意见，也都算是好事，可作为这份备忘录的补充。不如把这份备忘录和可能的勘误、反驳都集结存档，一起“供今后新的历史阶段的将来群众斗争中的先进工人和左翼行动者参考”。

（本备忘录写于 2019 年下半年；2020 年初定稿）

本文结构：

运动综述

A.基本问题 - 14 个；

B.政治原则问题（立场问题） - 4 个；

C.策略问题 - 7 个；

D.最后的反思 - 2 个。

简目

A.基本问题

<1>如何评价佳士运动的基本性质？

<2>如何评价佳士运动的成败？

<3>如何评价佳士运动的得失？

<4>佳士运动为什么未能充分调动民间左翼和泛自由主义民众？（或：为什么曾经在佳士运动最初二十多天积极参与支持声援的各派翼群众不久相继淡出了运动？）

<5>佳士运动为什么没有调动更多工人，却始终只是以深圳坪山 20 多名工人和数十（或几百）名高校左翼社团学生积极分子为主力？

<6>进一步地看，参与佳士运动者不乏有工人维权斗争经验丰富的积极分子，还有先进工人代表和维权先锋，但为何始终未能调动大量工人？

<7>佳士运动究竟何时已遭到失败，而佳士运动领导者为什么大半年来不承认失败？为何是到 2019 年 5 月才开始有人（例如潘毅）公开承认失败？（另外，这些大佬与运动究竟是何种责任关系，另见第 8 个问答最后部分的探讨）

<8>佳士运动为什么发动起来？之第一问：有关组织发动运动的最初动机以及考量方式是否可能有什么问题？（回应四种猜想或观点。谈及佳士运动主要参与群体、若干核心骨干分子、大佬们可能的真实心态）

<9>佳士运动为什么发动起来？之第二问：有关组织发动运动是否基于对 2018 年斗争形势的集体误判？

<10>如果今后再发生类似佳士的运动，工人群众基础一时薄弱，那么通过寻求可能的力量联合，对改善这一问题有没有很大的帮助呢？否则该如何？

<11>佳士运动积极分子大量的道德绑架行为反映了哪些问题？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12>佳士运动不顾一切批评质疑的这种强势的特点，能否说是因为形势紧急所迫，而非组织本身的问题？如果是组织本身问题所致，那么左翼组织如何在维持活动与决策高效的同时，避免官僚集权乃至民主氛围的丧失？

<13>深圳坪山青鹰社主要负责人贺鹏超的全面招供之后大量活动骨干很快被捕、佳士运动迅速走向终结，说明了什么？

<14>佳士运动为什么在一轮又一轮镇压之下仍向前走了半年之久（2018.7~2019.1）？这是否有什么正面经验？教训何在？

B.政治原则问题（立场问题）

<15>为什么佳士运动无原则默认、接纳各派政治解读？是否扩大了宣传、争取到了更多人的积极支持和声援？实际效果、教训如何？
（内含佳士运动最深刻的政治教训）

<16>2018年7月29日沈梦雨带领声援团首次聚集示威就集体打出了毛泽东画像，声援团把所有成员都包装成毛左。这是否有利于声援活动？教训是什么？

<17>从当时左翼自由主义学者陈纯的文章引用左翼圈内人的说法想到，新一代毛左真的与老毛左切割清楚了吗？佳士运动中的实际政治表现说明了什么？其后果是什么？

<18>佳士运动反复宣示毛的画像、话语、马列毛口号。这些宣示的动机、效果如何？此外，“马列毛主义”在佳士运动中究竟还有什么具体表现？这种实际政治模糊性意味着什么？

C.策略问题

<19>如何看待少数积极分子到派出所聚集抗议要求放人的行动策略？结合积极分子事后辩称，他们到派出所门口示威，是否“有效动

摇了警方介入佳士运动的决心”？是否达到了“痛打派出所”的效果？
这些辩解说明了什么？

<20>2018年7.27大抓捕后，被刑拘的29名工友和学生确实大多数人很快陆续取保候审，这否说明佳士运动声援策略当时奏效了、确有成功之处？之后.24清场，大多学生也只是被遣返回家，似乎损失不大？（与第19问相关）

<21>2018年7月到11月佳士运动一再出现“抓了又放、放了又抓”的情况，又传出即将审判的消息、结果却没有公审，这些情况为何发生？是否真的如同运动支持者所说，说明声援团的斗争迫使了当局“不敢”定性、“不敢”公审、抓了又放？

<22>佳士运动“组建工会”失败，是否能证明红中网对“工会路线”的批判？或者反而证明了CWI所指出的中国工人应当争取“独立工会”？争取组建或改组工会的作用/目的/关键是什么？

<23>从2017年底的“八青事件”到2018-19年佳士运动，左翼积极分子在强力机关里的妥协、认罪一再得到左翼圈内的理解和原谅。
问题：在强力机关面前的一切妥协认罪无论如何（比如出卖、导致其他人被捕或加重刑罚、劝说其他被捕者妥协）都是可以理解、原谅的吗？公开认罪的人出来后还能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吗？

<24>面对警方动员声援学生的父母到场施压的做法，声援团既争取了部分学生家人的支持，也发动了对部分成员家人的无情决绝斗争，例如公开揭发沈梦雨家长在其岗位上滥用职权的丑闻，号召公众关注、谴责，这种做法是否妥当？为什么？

<25>与过去的工人运动非常不同，从 2018 年广州日弘厂斗争到深圳佳士厂运动，都明显地先后突出沈梦雨、岳昕、顾佳悦、郑永明等少数几个人。最后再回看，如何评价这种树立少数几个“工运明星”的策略做法？

D.最后的反思

<26>：如何看待有网友批评某左翼“派系”/团体未对佳士运动表态，还批评一些人针对佳士运动发出“阻止更多损失就是正作用”的“止损论”。

<27>如果说佳士运动是失败的、根本路线是错的且教训累累，那么如何评价这场运动的一般参与者？这场运动对这些参与者来说是否有积极意义？今后如何对待这场运动的参与者？

（以上是各问题的简目。下列的正文里，问题会更具体展开。读者可按关键词，快速检索相应文段）

A.基本问题

<1>如何评价佳士运动的基本性质？

运动主导团体“佳士工人声援团”及其很多支持者、同情者都认为佳士运动是一场工人运动，或至少是“佳士工人斗争”，比如“青年先锋”网站在 2019 年 1 月 2 日说佳士运动是“一场自发的工人组建工会斗争，在左翼学生和工人等进步力量的参与下，变成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左翼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还有很多人对此模糊化处理，继续按最初的外部舆论称之为“佳士事件”，或者简单称为“佳士抗争”。值得注意的是，一直积极声援和最努力拔高鼓吹佳士运动的学者潘毅，在其相关左翼平台“怀火”上称为“佳士工学运动”，在相关讨论专题里一开头就明确主张：「佳士运动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罕有的以共产主义为想象的工人-学生连结运动」。

从基本事实看，佳士运动远远不是一场由众多工人发起或推动的工人运动，整场运动从头到尾积极工人全部加起来只有三、四十人，这个人数恐怕还不到这场运动全部积极参与者的十分之一，其实 90%以

上积极参与者是北京、南京、西北等地十多所高校的左翼学生社团，以及全国各地的左翼社工、民间左翼活动分子。争取或声援佳士工人建工会的权利确实是佳士运动始终的口号，但这种争取或声援最终唤起的新工人很可能不超过 40 人（最初聚集在坪山燕子岭派出所门口的工人是 28 名，后来各地零零星有一些打工者或个别高校后勤工人加入），对佳士工人的声援在 2018 年 8.24 以后就主要依赖学生运动了。从 2018 年 4 月到 2019 年 5、6 月，满打满算佳士运动总共就持续 13、14 个月，工人积极分子占据领衔主角地位只在最初 4 个月余，在 8.24 事件后大半年里佳士运动的实质转变为左翼学生运动，只是在舆论层面上一直挂着声援佳士工人的名义。更坦率地说，佳士运动参与人数最多的活跃群体其实是左翼社团学生、刚从大学毕业致力于工人工作的公益组织社工、以及其他民间的左翼活动分子，即使佳士运动里仅有的那三四十名工人也基本上都是因为更早与那些左翼社工和社团学生结识而投身到运动中来的。

那么佳士运动到底究竟是左翼声援工人建工会的斗争？还是左翼领导的工人-学生连结运动？或者是“真正意义上的左翼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这些冠名称呼都过于主观理想化，或只及部分、不及根本、远不能概括。当然问题不在于冠以怎样的名号，而是这场运动的基本性质究竟怎样。从总体的实质看：佳士运动其实是 **2010-2013** 年以来靠拢南方工人的相当一部分青年毛派左翼团体全力发动的一场不顾实际人为拔苗助长地把工人维权斗争提升到政治斗争水平、力图裹

挟工人大造声势的一场政治投机冒险运动。其中，工人积极分子发起的抗争努力只是从属性的、大多时候只是跟在左翼学生和青年活动分子后面亦步亦趋的追随者角色，而运动的核心领导者是一些知名高校或从中毕业没几年的、社会地位类似小资创业者的社会团体及高校社团负责干事和积极骨干以及少数学者知识分子大佬。

<2> 如何评价佳士运动的成败及其影响？

作为一场不顾实际人为拔苗助长地把工人维权斗争提升到政治斗争水平、力图裹挟工人大造声势的左翼政治投机冒险运动，佳士运动在总体根本意义上是失败的。这个运动只有在“大造声势”这个局部意义上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并不是佳士运动多数参与者和多数支持者的初衷（大多数人是为声援建会、救援被捕工人、声援工人维权斗争而来），只是少数运动核心决策者一味推动的结果，只是为少数“大佬”不顾工人和青年死活的拔高吹捧、借题发挥提供了大好舞台，而这种只对少数“大佬”有实际价值的所谓成功，却对应着极其惨重的代价。

而且佳士运动的失败是以核心骨干分子的集体低头认罪收场的——这是一个被许多人故作轻描淡写但有着极大恶劣性的可耻结局，还伴以线上声援团从头到尾打肿脸充胖子、坚持不懈忽悠越来越少的支持

者同情者继续冒险送死的癫狂鼓噪，以及对这场运动负有部分重要责任的代表人物之一潘毅自始至终恬不知耻的拔高鼓吹。所以，这样的失败没有丝毫的“虽然失败但是伟大”、“虽败犹荣”的意味。正因为这些核心骨干分子的表现，佳士运动失败得极其不光彩。

2018年11月初，佳士运动里有一种声音传出：尽管佳士事件造成了“个别”同志被捕的后果，但这次事件无疑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一批左翼工人、学生在斗争中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包括胆量、决心、斗争技巧等。就在这种声音话音刚落不久，统治当局随即展开佳士运动以来最大一轮、第三轮大抓捕，包括被捕后很快供认大量左翼活动情况、后来在镜头前低头认罪的青鹰社创始人贺鹏超以及该社其他职员和热心工友，以及众多学生社团积极分子、声援工人。不管声援团怎样事后辩解开脱，贺鹏超及其他一些运动骨干分子的大量供认和低投入认罪都相当沉重地打击了受其影响的左翼学生和工人的政治信心、决心，对于他们中的一些热忱坚信者来说甚至是毁灭性的精神打击，甚至引起了被侮辱感，这极大地冲击抵消了所谓一批左翼工人、学生得到“很大锻炼”那样的很初步的局部成果。

在2019年1月底，也就是正当官方一轮又一轮打压接踵而来时，又有一种声音传出：我们都大大低估了佳士事件，其实佳士事件最少有两大成绩，一是推动坪山25人以上企业建立了工会，二是“极大”

地打击了统治集团的政治威信和统治信心，在政治上动摇统治集团的声誉，加速他们在民众中间的政治破产，乃是斗争之关键。

这种说法可能有部分事实，即可能真的加速了官方工会推广在 25 人以上企业建立了工会的原定计划（经查，全总早在 2017 年 5 月 26 日就发布过包含这一计划的工会建设意见，深圳市坪山工会官网当天就转载了工人日报的相关报道）。但是，这是非常可疑的“成绩”。因为官方工会最有改革动力的那几年（2007-2012，当时官方工会在基层企业工会改选中吸收了工人斗争积极分子，并认真尝试劳资集体协商制度实践，推动改良）早已过去，2013 年以来，官方工会改革派的路线已经被否定，官方工会及其基层工会很少再起促进维权的作用，更多恢复到原来的不作为，或者在发生劳资冲突时帮助资方忽悠驱散工人、降低工人诉求。工会或厂内原有的劳资协商机制要能起作用，除非有余浚聪那样少有的左翼工人积极分子或者沈梦雨那样更加少有的能在工厂扎根两年以上的“融工”左翼青年很有意识地争取加以利用，但佳士运动以后无论当局还是资方都大大加强对一切接近工人的民间组织的打压力度（比如早在 2018 年 8 月 4 日坪山区人力资源局就邀请有专业背景调查实务经验的专家面向区内企业举办“员工背景调查实务及运用”专题沙龙讲座），所以佳士冒险投机运动使得这点机会都早已经变得更加渺茫。

至于说打击了统治集团的政治威信和统治信心，事实正好相反：从佳士运动最后半年社团学生遭遇的安全机关人员的极尽蔑视、侮辱态度（参见 2018 年 12 月底和 2019 年新学期开学以来原北大马会成员自己公开揭露出来的屈辱遭遇记录，有据可查），已尽显统治集团淫威，加上 2019 年 1-3 月陆续披露出来的贺鹏超、顾佳悦、郑永明、岳昕等众多核心骨干分子有理有据的认真忏悔和认罪视频文字记录——这些早在 2018 年年底就已经通过官方所录制的视频的方式在部分学生中流传，更有贺鹏超在 11.9 大抓捕中被带走后很快就妥协招认的长篇供述书（据红中网李明骐得到的内部消息：不晚于 2018 年 12 月初，青鹰社主要负责人就写下了长达 80 页的坦白材料），官方更是把贺鹏超的长篇供述书发送给全国各地派出所、打印传阅给那几个月里其他被带到派出所的各地毛左青年阅读，以作为最佳的劝降材料——更可谓大长了统治集团的威风和气焰。

不过，从当局对佳士运动前两轮打压的相对宽松和后几轮打压大为加强力度的情况来看，统治集团先前确实存在大大低估佳士运动的问题，但这与是否打击统治集团的政治威信和统治信心是两码事。

我们需要有勇气承认：佳士运动遭遇了惨败，且极其的不光彩，——那些极其不光彩的方面比失败本身更让人感到丑陋不堪、耻辱和厌恶。事实上，这种极其不光彩的惨败（尤其是所谓的声援团始终强硬拒绝一切批评反思、最终惨败时仍然还是完全一副自我感觉无比良好的嘴

硬强辩姿态)早已经造成了可怕的政治影响:不少左翼直接或间接受此事件影响变得消沉了,或者更消沉了。这其实也是本备忘录开头所说的佳士运动至今仍没有一个认真讨论佳士运动主要教训的文件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没有勇气承认这些事实,我们就无以对整个佳士运动做出客观冷静的总结,乃至无以对今后新一代的同路人实践者做出这个历史阶段应有的交代。

<3> 如何评价佳士运动的得失?

谈一个运动的得失,总是有一个常被人忽视的前提:主语是谁?对谁而言谈得失?

谈佳士运动的得失,是对左翼而言,还是对工人阶级而言?

对目前斗争水平下的工人阶级来说,佳士运动的影响其实很小,它的失败只是让工人群众损失了一些提升斗争水平的特殊机会和可能性(左翼、乃至加上其他 **NGO** 的介入都只是工人群众提升斗争水平的机会和可能性之一)。工人阶级因为大工业的兴起而聚集发展,其社会生活、组织性和斗争的水平有自己的发展动力,左翼或其他 **NGO** 即使不介入,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斗争水平也会自行发展。

但对于目前社会政治状况和发展水平的左翼来说，佳士运动的兴起、风波、被镇压和覆灭，却给 21 世纪最初二十年的左翼和整个劳工维权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直观地看，首先佳士运动的被镇压和覆灭，大大激发了统治集团的政治警觉和镇压意愿，使得近二十年来所有服务工人的左翼乃至其他绝大多数工人维权活动者的活动前景都遭到灭顶之灾，现在这种情况下，新人想要再来做有组织的服务工人活动已经寸步难行了。

正如一个“大陆工人斗争参与者”在 2019 年 5 月的访谈中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认识的接触工人、了解工人的人、渠道和资源都被打掉了。那些直接做劳工集体权益的机构实体、人、场地、活动的空间、信息的渠道都没有了，人的话有的被警告、有的被抓、有的自己害怕。甚至一些普通公益机构的活动都被限制了。」（《对话大陆工人斗争参与者：佳士学生进厂的工作思路批评》，访谈于 2019 年 5 月 23 日，6 月 5 日刊载于“怀火”网站）

这样的结果对这个阶段的左翼来说当然是巨大的损失。但是大家都能看到佳士运动在专制政权一轮又一轮镇压之下仍向前走了半年之久（从 2018 年 7 月中旬到 2019 年 1 月中旬，整整半年保持着前进的状态），确实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即使最后失败了，但这其中的动力是否有什么正面经验？这其中的斗争是否真有技巧和经验上的收

获？从局部战术层面来说，这是可以探讨的（见本备忘录第 14 个回答）；

可是有人想把其中一些局部的成果上升到整体意义上，把佳士运动说是开创了一种斗争模式，或者是说失败中也有很大胜利、虽败犹荣什么的，那么就意味着这些人不打算从这场近几十年来（可以说是自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最疯狂的机会主义冒险中吸取哪怕半点教训，还反而把机会主义冒险失败案例奉为正面典型，想要继续粉饰包装、祸害后人。这对于工人阶级和进步青年的利益而言是祸害；但对于盼望着吃人血馒头的左翼政治投机家们来说却是一个重要收获，因为他们可以从中总结一套忽悠工人、笼络青年、欺骗大众、道德绑架劫持左翼同路人为其火中取栗“搞大新闻”、做大运动的模式。

<4>佳士运动为什么未能充分调动民间左翼和泛自由主义民众？

潘毅在 2019 年 5 月访谈中提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总结：“佳士作为左翼运动的第一炮，并没有打响，而是打出了一场悲怆的结局。这种结局是不是只是归结为学生的冒进？……民间左翼力量没有广泛地动员起来支持工人和学生，让他们处于孤立的状态，那他们等待的就是被捕的命运。失败的责任，当然有经验不足的学生高估了民间左派

的支持力量，但是最大的责任恐怕不在他们，而在有鸵鸟心态的自称左派的人。”

然而上述问题的提法并不符合佳士运动的历史事实。事实是佳士运动从 7.20 事件公开化之后，立即得到越来越多左翼尽可能的舆论声援（在 7.23 佳士工人联名信发表后不到一周左翼已经动员了过千人的联名），以及线下一波又一波各地民间左翼群众组团奔赴深圳坪山为声援团加油打气（从 8 月初到 8 月中旬），事实是在 8 月中旬后民间左翼群众支持者开始减退，逐渐淡出运动；不止是民间左翼，还有泛自由主义的民众（民间热心活动者、网民、学者）也在同一时期相继失望、沉默，淡出运动。所以真正问题应该这样归结：为什么曾经在佳士运动最初二十多天积极参与支持声援的各派翼群众不久后却相继淡出了运动？

简单概括说从 2018 年 8 月开始有以下三个因素缠绕在一起共同发挥了大力驱逐各派翼热心群众的作用：

一、从 8 月初开始佳士运动呈现出一再向党中央表忠心、寄望最高层来解决佳士工人诉求的强烈特点，这直接引起了相当部分民间左翼的强烈反感和批评，但佳士运动核心骨干分子完全无视这些批评，反而把民间左翼里少数最敢言的批评者扣上“内贼”“大奸细”帽子并到处发通告指示“马上拉黑他们”“把他们从我们自己建的群彻底清除”

“任何人不准拉他们进群”（均有据可查），虽然最敢言的批评者只是少数，但这种严打左翼同路人批评的做法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杀一儆百”作用，让其他潜在的热心支持者同情者心寒、不想再多说话了。

二、更早从7月下旬开始就陆续有运动的支持者或同情者批评运动操之过急，建议沉下来做争取团结工人群众的工作，在7.27大抓捕后仍然有人劝导避免做直接与暴力机关正面对峙冲突的线下政治示威行动，而是改为法律协助被捕工人、舆论方面的声援。这些策略上的批评和建议，不仅通过网络传达，更有很多人当面劝告，但全部遭到了实际的否决、无视。少数比较敢说真话、提出策略或路线批评的热心者还遭到了佳士运动核心骨干分子在多个微信群里的公开骂街（均有据可查），这让众多愿意说出真话或更多的本来打算说出真话的热心者心寒、不想再多说话了。

三、佳士运动核心骨干分子坚决反对针对他们任何策略做法的任何批评，但是无原则地接纳和转发只要是能扩大其运动声势的一切宣传，无论是国家主义毛派乌有之乡的拥党爱国宣传，还是鼓吹“深圳佳士工潮左派挑战习近平”的海外自由派媒体的宣传，结果是不论拥党爱国的乌有之乡支持者还是反共的支持者都把佳士运动当做一时炒作起来的噱头焦点，都只是一时热闹起哄的投机式关注而不是真心同情支持（真心同情支持的热心群众因为前两个因素反感、心寒、陆续不

想再多说话了），在 **8.24** 大清场（在 **8.23** 还发生了大量相关微信用户同时被封杀事件）之后这些网络围观起哄式的支持舆论也开始散去。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佳士运动直到 **2018** 年 **11** 月在第三轮镇压时在新的内部批评压力下才终于出现了“反思运动是非常必要的”声音，彼时原有的支持同情群众基本上早就已经消散，运动的实际内容早已变换（从齐聚坪山声援佳士被捕工人的迫切斗争，变换为高校学生关注声援佳士工人和失联学生的学生运动和网络舆论运动），之前被声援团努力赶走的民间左翼和泛自由主义等各派翼群众更加不再关注佳士运动，佳士声援团只能靠持续翻新的活动内容和宣传来吸引其他的新的围观群众。

<5>佳士运动为什么没有调动更多工人（据上市公司财报，截止 **2017** 年底，该公司员工总数 **1012** 人），却始终只是以深圳坪山 **20** 多名工人和数十(或几百)名高校左翼社团学生积极分子为主力？

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持续一年有余的佳士运动的最初三个月：**2018** 年 **4** 月中到 **7** 月中，这是在佳士厂内的斗争发起阶段。在这一阶段，几名佳士工人积极分子发动了两场斗争：**4** 月 **15** 日开始反对佳士厂不合理罚款制度“佳士十八禁”的斗争和 **5** 月 **10** 日开始联名争取建工会的斗争。从投诉维权人数和建会联名人数的变化，可以看

出佳士工人积极分子“做工人工作”的努力确实有成效，短短几个月里有较大进步，但规模仍有限：更早大半年前**2017年7月**余浚聪等**10**来个佳土工友去劳动局投诉过厂里的调休请假拿双倍工资来补的问题，**2018年5月10日**佳士建工会申请**28**名工友联名，**7月10-12日**集中征集联名，到**12日**有**89**名佳士工人签了加入工会意愿表。关键是，在入会申请上签字有多少人还远不等于投入直接行动就有多少人，从佳士厂**89**人签字申请建会，到两周后的行动来来回回只有**20**多人（其中还有部分其他厂前来声援的工人），就可知。

看来似乎是佳士厂积极分子“做工人工作”的时间不够？但是佳士厂积极分子在抗争中表现过于激烈突出（相对本厂多数群众的隐忍保守状态来说），很快引起厂方高度警觉，**4月26日**佳士人事部门人员就公开在坪山区企业HR千人QQ大群里指名抨击余浚聪等**4**名员工，更建议坪山各企业建立黑名单，“慎重录用”这些“特别难搞的员工”；**5月3日**余浚聪在自媒体发文提到“此前因为我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厂方千方百计的打压，用了各种手段逼迫我走”；到**5月10日**申请建会联名信提交的当晚，余浚聪就被宣布开除。其他几个工人积极分子也遭到了各种压力（企业刁难成立工会、对积极分子调岗、辱骂、殴打、威胁开除等），最后在**7月16-18日**被集中暴力开除。

后来一个署名 Shannon Lee 的评论指出：「工人到底在什么情况下可能行动？通常需要有一个大家关心的焦点，也就是集体诉求。十年前的焦点是欠资、减薪、不及时加薪，近些年许多人开始要求搬厂必须有经济补偿金，或者补缴社保。……那么佳士抗争呢？可以初步判断，现阶段佳士还没有出现一个能刺激大家的利益焦点。」（《佳士事件短评》，2018年11月3日，作者署名“Shannon Lee”）

这个评论更符合最近二十年来珠三角工人斗争发动起来的普遍情况。不过该作者后面还说老板用“集体持股”凝聚了管理层，加上少数积极分子也不成熟，“难以带动更多工人，找准合适的时机发起集体行动”，这样的评论还有探讨空间。如果这批工人积极分子能等得到出现一个大家都关心的焦点时再做动员和发动抗争行动，再结合争取工会的努力，是可以成功的；问题在于能否等到这样的时候而不被企业先下手开除？这个几率确实存在，但佳士厂积极分子相对本厂多数群众表现过于激烈突出——假如说他们能更耐心启发团结工人权益意识而不是过多刻意制造冲突，可以在厂里呆更久些，也就更有机会等到大家都关心的焦点出现时。

但是从佳士运动一开始到 7.20 事件公开化、到后来一步步扩大发展一直都是“层层加码、不顾一切批评质疑、极力扩大化”的态势来看，尤其结合贺鹏超、郑时友等人公开供认的佳士事件早已筹划已久、有一系列组织安排等情况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做这样的合理推断：佳士

运动核心主导者早就做好了无论如何也要把斗争持续扩大发展下去的决心。这样一来，也就断绝了上述的佳士厂积极分子改进工作方法争取更多工友的可能性。

我们截取《佳士事件主要策划者贺鹏超等人认罪视频文字版》

（2019-3-3）里有关佳士事件前期准备情况，看看他们曾经投入了多大的努力：

「郑时友：16年，我们先选定了两个公司进行工闹：佳士和xxx，但后来没有这样做，先做工作发展人，在一个厂能够长时间待着。

贺鹏超：为提供后方支援，我成立了青鹰。

佳士事件是从2016年8月开始策划的。经过筛选，我选定了佳士厂，安排了邹丽萍进去社区工联工作，又安插了人进入佳士厂，确立了以组建工会的斗争为导向。」

所以佳士运动为什么没有争取到更多工人，可以解释为佳士运动主导者早就投入了很大努力、不想因为积极分子被开除而放弃辛辛苦苦筹划已久投入了很多资源的原定计划、一开始就抱有无论如何也要把斗争持续扩大发展的决心。（这可能符合经济学所说的“沉没成本”的影响，即：由于害怕过去已经付出的“成本”——包括时间、精力、

金钱、各种努力在项目运作中半途而废、即“沉没”、再也收不回来，因而继续原来的错误，结果却造成更大的亏损）

<6>进一步地看，参与佳士运动者不乏有工人维权斗争经验丰富的积极分子，还有在工人集体行动中脱颖而出的先进工人代表（比如尚杨雪）和得到众多工人敬佩的维权先锋（如沈梦雨等），但为何始终未能调动大量工人行动参与佳士声援？

首先，在不具有普遍斗争气候的日常资本主义秩序下，工人参与到一个有较多群众自发参与的维权斗争事件并认可其中的积极分子是一回事，工人是否还会参与该积极分子发动的尚不具备较多民意基础的维权斗争却是另一回事，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日常统治秩序下的普遍现象。

第二，佳士运动的最初厂内斗争只有三个月、仍在争取建会群众基础的半途中就被资方踢出了厂，在厂外明显更不利于集中争取团结工人，此时如果改变、降低原定计划，改为依法斗争的同时耐心做工人工作（就像沈梦雨广州日弘厂维权斗争那样），不是不可以把斗争继续发展下来，但佳士运动却从**2018年7.20**事件开始一路狂奔层层加码，在紧接着的短短一周里采取了各种激烈高调亢进的策略做法——多次聚集派出所门口抗议示威、多次聚集厂门口用扩音器喇叭喊话、几个人组队奔跑强行冲破厂方在厂门口组织的人墙防线、多次与厂方人

员和警察正面对峙冲突、冲进厂方组织的工人下馆子聚餐活动发传单提出一大堆不切实际、让人更加困惑疑虑的高诉求（有据可查：诉求多达 8 条：每月的底薪涨到 3 千、加伙食补贴 500、加外宿补贴 300、加全勤奖 200、加工龄奖 100/年、年终奖按实际工资算、工人自选工会、对殴打员工一事负全责）——本来已经是被驱逐出厂的少数人，还做出这一系列更加激烈高调亢进的诉求和行为，这无疑让其他工友更加不敢接近这些人，甚至恐怕连一些本来同情他们的佳土工友都会疑惑：这些人究竟是要干什么？

<7>在 2018 年 8.24 清场后数个月里，佳士运动领导者一直不承认失败，一直到 2019 年 5 月潘毅访谈中才承认“佳士作为左翼运动的第一炮……打出了悲枪的结局”，并谈论“失败的责任”。那么佳士运动究竟何时已遭到失败，而佳士运动领导者为什么大半年来不承认失败？为何是到 2019 年 5 月才开始有人公开承认失败？（另外，潘与佳士运动究竟是何种责任关系，另见第 8 个问答最后的探讨）

还原历史事实，在 2018 年 7-8 月，几乎所有人都以为佳士运动就是一批工人积极分子的维权和争取工会的抗争、而后是一些泛左翼的学生和群众起来声援被捕工人积极分子的运动，几乎所有外部观察者都没有想到在 8.24 之后运动仍然没有消停，反而从 9 月开始逐渐转变为以社团保卫战、争取被打击报复学生复课、要求释放岳昕和顾佳悦

等斗争内容的北京、南京等多所高校校园内的学生运动。所以，从工人争取组建工会的角度看，佳士声援者在 2018 年 8.24 时就已经失败了，而且由于再也无法聚集到深圳坪山做工人工作，继续争取团结佳士工人、重新展开工人运动的条件也完全丧失了。

但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以声援佳士工人为名的高校学生运动兴起，在学生运动和网络舆论的意义上，继续延续着“佳士工人声援团”这一组织名号，继续延续着“佳士运动”的说法，原有的工人积极分子也依托着各高校的学生运动和一些民间左翼的掩护在各地串联活动，**实际上就发展为一小批工人跟着左翼学生和社会活动分子的团体到处串联去争取全国各地更多的群众进行政治抗议斗争的运动。**这场运动的这些活动内容其实是 2018 年 9 月份重新展开的，直到 2019 年 1 月被彻底镇压前，他们当然还有理由辩称他们没有失败。

2018 年 11.9 大抓捕后贺鹏超等人做出了长达 80 页的长篇供述书和认罪材料，其后 12 月底到 2019 年 1 月，北大、人大等高校的主要积极分子被捕，社团被“改组”，深圳微工汇成员相继被捕。到 1 月中旬时，佳士运动在运动层面已经完败、完结了，只剩下零星的个别的抗争和少量活动。再经过 3—6 月持续抓人后就已经是全军覆没了，再嘴硬也没辙了。

<8>佳士运动为什么发动起来？之第一问：有关组织发动这场运动的最初动机、考量方式是否可能有什么问题？

我们当然没有头脑简单幼稚到认为佳士运动从工人积极分子发动斗争阶段到学生运动阶段都是按照某个预先写好的精密剧本计划完全一手策划导演出来的。但是现在确实缺乏足够的可信的材料来判断运动里每一步的走向有多少成分是运动与国家、各方力量之间冲突的客观结果，有多少成分是主导者的预定计划。我们这里只能根据运动内外曾经在一定范围流传的一些猜想，结合运动呈现出来的实际结果，反推有关组织发动运动的动机、考量是否可能存在什么问题。

佳士运动对于有关组织的最初动机或考量方式出现过至少四种在一定范围流传过或是由曾经相当接近核心群体的人士提出过的猜想或观点：

①从日弘厂到佳士厂、乃至 **2018** 年秋冬的高校社团保卫战，都几次出现过“都已经被开除了/被阻止年审社团了，反抗是死，不反抗也是死，不如最后一搏死得其所”这种论调。这能成为佳士运动发动起来、并且层层加码不断升级的理由吗？

答：这不可能是佳士运动发动起来、并且层层加码不断升级的主要理由，但有可能是核心骨干分子用来动员工友和学生群众的一种说法，

或是一些佳士运动支持者为行动所做的事后辩解。这样判断的根据在于，至少在**2018年8月**下旬以前，佳士运动线下声援团很明显充满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在日弘厂最初声援沈梦雨（**2018年6-7月**）的舆论也是一片日益升高的乐观情绪，尽管当时的声援都有些担忧和疑虑，但积极斗争情绪绝对是压倒性的主流，所以首先在“从日弘厂到佳士厂”的斗争里都不存在上述“不如最后一搏死得其所”的绝望拼命心理。

至于后来的高校社团保卫战，还原当时（**2018年9-12月**）历史事实，也不是单纯只是在保卫高校社团，还贯穿了各校学生声援佳士工人、宣传工人和学生连结的正当性、关注北大失联校友和争取被打击报复学生的复课、人大学生维护社团举办服务工人活动的权利等众多斗争内容，期间，还有高校社团学生积极分子、工人积极分子、左翼社会活动人士的大胆积极串联（由于警察到处镇压和声援团自己发布的揭露，这些都早已不是秘密了），这已经不单单是在保卫社团，而已经是一场大范围的学生运动和群众性的相当活跃的政治斗争。显然，仅仅因为社团保不住了而决心最后一搏放手斗争的说法，远不足以解释如此规模的斗争。这种说法充其量只是一种动员那些还在观望的同情群众加入行动的说法。

②或者，青鹰-北马系的这个组织，在发动佳士运动前，是否产生过激烈的高层意见分歧、内部斗争，从而使得主导的一派为了维护自己在组织内部的权威，死活不肯承认错误、调整策略，以至于一条死路走到底？

答：有人在佳士运动后的反思中有这样的猜想。至少“死活不肯承认错误、调整策略，以至于一条死路走到底”是佳士运动早已呈现出来、持续到底的实际表现，但至于原因是否是“产生过激烈的高层意见分歧、内部斗争，从而使得主导的一派为了维护自己在组织内部的权威”，这一点很难说，因为现在缺乏举证。不过在共运历史上，斯大林为了在激烈的党内斗争中维护本集团的权威确实持续数年、层层加码推行在中国革命里的极左盲动冒险路线（1927-1930年代初），当年造成了中共在城市的组织几乎全军覆没，连江西的苏区也被连根端掉，从运动模式、实际过程和后果来看，佳士运动确实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当年。在佳士运动还进行时，就有左翼提出过1920年代大革命被扑灭后中共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所犯的左倾冒险路线的教训，警示今人。

③有人提出：从2017年的11.15广工读书会事件发展成2018年初引起广泛关注的“八青年”事件，一些青年毛派当事人的心态急剧膨胀，变得狂妄自大，无视批评、绑架同路人和同情者、层层加码造势佳士运动都是后续发展。这种看法是否符合事实？

答：首先说明当年关注八青事件的很多人恐怕还不清楚的一些早已不是秘密的内情：因为 2017 年的 11.15 广工读书会事件而在 2018 年初站出来轰动全国舆论的这八位左翼青年：张云帆，叶建科，郑永明，孙婷婷，韩鹏，黄理平，顾佳悦，徐忠良，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个人家庭原因、以及若干内部意见冲突原因），到 2018 年 7 月初时的“八青年”只剩下了郑永明、徐忠良、顾佳悦三人，但他们后来一直打着“八青年”的招牌进行活动。同时青年毛派从北京、南京等地高校左翼社团以及从工人斗争中突出的积极青年里吸收了不少“新鲜血液”补充到新的运动核心里，这可能使得他们反而更有自信继续打着“八青”招牌进行活动。

所以当现在有人提出“八青”一些当事人心态急剧膨胀、变得狂妄自大、后来又在佳士运动里一系列冒进做法时，很显然只是指上述三位：郑永明、徐忠良、顾佳悦。这个观点来自曾经相当接近核心群体的人士。从 2018 年 7 月底到 8 月，郑永明、顾佳悦、贺鹏超（据其供述书，网名“大江流”）等人亲自上阵对微信群里的其他群众批评意见进行公开骂街式、污蔑性的回应（有据可查，全部有截图证据），可以较为有力地佐证这种观点。

当然，心态急剧膨胀、变得狂妄自大的应该不止上述几个人，应该还有更多一些人，例如受他们传染的其他一些青年毛派，或者是比郑、

顾、徐等人在组织内部层级更高的核心骨干成员。虽然外界可能永远难以搞清楚为什么连当初备受尊敬、被公认为“八青年”代表人物的张云帆，都在 2018 年 6 月底之前默默退出了“时代先锋网”团队（佳士运动期间张云帆的朋友圈转发过几篇相关文章似乎意在表态支持运动，不过他早已不再参与积极活动，这应是事实），但是如果一个仍然没有丢掉基本理智、还没被巨大舆论冲昏头脑的左翼青年选择默默地离开了一个他至少怀有过感情、但却正在奔向集体政治疯狂的团队，我们至少应该对这一举动予以基本人性和道义上的理解。

④最后，是否有少数左翼、工运界大佬多年来迟迟看不到左翼工运兴起而感到绝望、所以孤注一掷押上自己名誉在佳士运动上赌一把的心态？

答：从较大层面来说，佳士运动大致有三个参与群体：青鹰-北马系的毛左青年学生，潘毅系的毛左工人工作者和进厂“融工”青年，红中网-张耀祖系的老左派，（另外，乌有系的老左派只是 2018 年 8 月里的一段时间喧嚣一时，8 月后就销声匿迹了）。这些群体大部分是高校大学生、或高校大学生出身的社工，少数是在左翼圈或工人活动方面混迹一二十年的中老年左派。例如张耀祖，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就开始做下岗工人调研、串联等活动，世纪初从体制内辞职出来专门做各地工人串联团结活动；潘毅更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就在内地进

过工厂，创建过最早的民间的女工组织，在其影响下推动发展过一系列的劳工 NGO；还有一些相关联的老工人、老党员，比如 2009 年吉林通钢斗争的老工人代表吴敬堂，革命战争年代就入伍参加新四军的老战士“丑牛”（毛派老左圈内知名网名），都在圈内很有资历，斗争事迹可追溯到几十年前。

这些老人都比青年人更多见识到近几十年来斗争的浮沉兴衰，也比青年人更深切地对比、感受到当前又处在一个政治空间收缩、斗争实际是下行中的时期了，可是此时他们要么已经深入迟暮之年，要么已经投入一二十年工夫或以一二十年经验资历辛苦投入影响带动起了一批青年有生力量，现在眼看一个有组织斗争的历史阶段正要从兴盛走到衰竭（从 2015 年开始国内无论劳工、律师、女权、公民、环保各方面独立社会运动都遭遇国家铁拳的重挫而逐渐衰微）——再错过年轻气盛的青年毛派所竭力发动的佳士运动，“过了这个村就再没这个店了”，有理由相信一些老人比青年人更看得清这一点。这可以解释一些老资格的活动家为什么就像完全毫无经验、或显得被绑架了似的一样站到运动前台配上“号召广大热心人士支持佳士工人……请速速赶赴深圳坪山燕子岭！”这种为极左盲动冒险火上浇油的鼓动。

（特注：2018 年 8 月时“八青年”的“时代先锋网”的每篇文章底下以及“佳士工人声援团”网站发布的联名信底下都写有以下的話——有据可查：

「同志们！请赶往深圳坪山燕子岭派出所，和佳士先进工人一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佳土工友声援团代表吴敬堂、古正华、范景刚、张耀祖、时迈携声援团 1200 余位同志（截至 2018 年 7 月 29 日），号召广大热心人士支持佳士工人阶级的正义斗争！！！」

「请速速赶赴深圳坪山燕子岭！与先进工人一起为正义事业奋斗！！！」

有意思的是，五个月后，张耀祖通过李明骥这个中间人传话辩解说他当初就不赞同佳士运动的冒险，还曾极力劝阻过青年毛派们，以此来与当时败相毕露的佳士运动做政治上的切割，但是张耀祖却还是在 2018 年 7 月 29 日很自觉地把自已的“前中国工人网主编”的大名押注在佳士运动最前列为之鼓吹，还带动了一些信任他的、却更不了解青年毛派底细究竟的老工人、老党员一起站在前列为这场极左冒险火上浇油。这个实际行动本身说明了包括张耀祖本人在内，即使在 2018 年 7-8 月很多左派大佬都没有彻底认识到佳士运动的冒险错误，而是多少带有赌注取胜的幻想。既认为不可能取胜、但又不妨留一手下注，这并不是什么特殊复杂的想法，古今中外所有的赌徒都是如此。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人都是油滑的政治赌徒，恐怕更多的老人只是不知佳士运动的究竟，怀着天真的理想主义和对左圈内那些人的信任，就欣欣然不吝夸赞支持起青年毛派来。

潘毅此前大半年来一再高调拔高佳士运动的历史意义高度，也引起一些人质疑她有“多年来迟迟看不到左翼工运兴起而感到绝望、所以孤注一掷押上自己名誉在佳士运动上赌一把的心态”。

但也有人辩解说，潘老师未必是明确的赌徒心态，她可能几乎对任何比较有影响的运动都有盲目乐观盲目拔高的心态，她可能是在潜意识中补偿当年她参与六四运动失败所带来的阴影（详见“佳士运动专辑”文件夹潘毅部分的资料），巴不得每一次新运动都能带来局势的彻底反转和改变。

这样说来，这些长期生活在极权统治下的中国、有着一二十年丰富的现实社会生活经验和抗争运动经验的中年以上的“大佬”究竟是真的太天真烂漫、或始终心怀纯真理想主义青年时代参与民主运动留下的愧疚感，还是确实有政治赌徒投机心态，似乎有点难以说清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佳士运动这场青年毛派所主导和发动的运动里，对于错误的极左冒险路线和惨痛牺牲的后果，那些老人也有着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不论他们出于什么心态。

至于这些大佬究竟只是“外围声援者”还是说起到了更大的实际作用，对这个问题的探究既不利于仍在持续遭受专制强力迫害的运动相关方，也已经超出了本文作者实际所知，最好还是留待若干年风云褪去

之后有更多资料自然披露时再说吧；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公开舆论及历史渊源、已有后果上都可以清楚看到这些大佬对运动进展是负有部分重要责任的，不只是起了外围舆论声援的作用那么简单。

<9>佳士运动为什么发动起来？之第二问：有关组织发动运动是否基于对 2018 年斗争形势的集体误判？

具体来说，从 2018 年初引起广泛关注的毛派“八青年”事件，加上 2018 年上半年一系列一时影响很大的群众斗争事件频发：如全国各地高校反性骚扰的米兔运动以及其中一时形成的女权主义、左翼自由主义、部分“反国家主义左派”的松散配合的阵线，多地发生的沃特玛电池厂工人斗争，上海长宁环卫工人大罢工，全国各地的塔吊司机要求涨薪的罢工和集会，全国各地卡车司机集体行动，全国多地的外卖员快递员罢工，各地此起彼伏的退伍军人维权抗议运动，湖南尘肺工人到深圳维权，富士康工人追缴公积金的斗争，深圳龙华等地工人反对开发商入驻导致房租上涨所引出的抗议风潮，以及左翼“融工”青年沈梦雨带领的广州日弘厂斗争在 7 月份得到众多工人和劳工界众多大佬人物支持，是否都让当时关注群众斗争的青年毛派和其他泛左翼圈产生了一种斗争形势正在上升的集体误判？以致于青年毛派想要通过扩大声势推动出一个“左翼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来引领各个政治势力、驾驭领导这一大好局面，把广大的群众维权斗争提升为政治斗争？

这是本备忘录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也可能已经是最难解答的问题，因为随着 2018 年群众斗争的退去和现政权在佳士运动刺激下前所未有地大大加强了镇压一切社运和异议的力度，之后再也看不到对这一短暂斗争热潮时期的形势判断的反思和讨论了。目前只得把这个问题悬置于此，待将来再看是否遇到合适的时机、有知情人愿再出来追究这个问题了。

（目前仅知：网民“秋火”在 2018 年 9 月 3 日文章《抗议镇压建会工人和声援群众，抛弃幻想清醒自卫！》第三节对一些左翼的形势判断做出了批评、提出了看法。但遗憾的是孤掌难鸣，这一批评没有引起任何讨论）

这里顺便要纠正的是，海外民运“自由亚洲电台”曾经报道说 2018 年塔吊司机、卡车司机的大罢工都是左派（青年毛派）领导的，这完全是夸大其词的政治炒作。当时打着毛派“八青年”招牌的“时代先锋网”确实积极报道了上述所有斗争事件，有些还实地联系、深入采访当事人，但他们在佳士运动之前没有亲自组织过任何群众斗争。上述所有群众斗争里，只有少部分发生在深圳的工人斗争和广州日弘厂斗争、一些校园工人维权是在青年毛派协助和组织下进行的；2018 年的塔吊、卡车、外卖员、环卫工人等在行业内影响很大的斗争明显

都是自发的，左翼只是做了一些追踪报道以及在事后联系了一些积极分子进行访谈（这些当时就有公开记录发上网的，都不是秘密）。

<10>如果今后再发生类似佳士的运动，工人群众基础一时薄弱，那么通过寻求可能的力量联合，对改善这一问题有没有很大的帮助呢？
否则，应该怎么办呢？

（感谢数个月前的一位热心网友提出了这个很有价值的问题）

首先，这个问题包含的良好动机要能发挥作用，那场运动就不能是佳士那样的少数核心骨干分子操纵下的极度独断专行的组织结构，否则正如佳士运动所显示的，它会按照暗中操纵的很少数的核心骨干分子的决定一意孤行、对一切批评和建议都一律无视、拒绝、否决、甚至不惜公开骂街、群起围攻。所以前提是：这场运动最起码得能够倾听群众声音。有了这个前提，讨论“怎么办”才有实际意义。

佳士运动在 2018 年 8 月时至少有三个主题：争取建工会，争取释放被捕工人，要求严惩警察。“寻求可能的力量联合”对后两个主题有用，对于建工会的目标完全没用。

要建工会，需要有积极分子在厂里活动，需要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如果一面是在厂门口每天上演激烈的抗议示威，劳资对立尖锐化，资方正在睁大眼睛全力清除厂内一切潜在的不和谐分子，另一面再有其他积极分子在厂里对工友做争取工会的努力，就非常难搞了。所以得完全改变激烈抗议示威的路线，改为更耐心做工友工作，得尽早改变，在第一个积极分子可能面临被开除危险时就得改变路线，而不是像佳士运动那样一小批积极分子全数被开除出厂、没有做耐心争取工人的条件了，只能在厂外反复声嘶力竭干吼“要求组建工会！”可光喊口号就是几十个人在工厂门口天天大喇叭喊话都喊破喉咙也无助于争取工会。（这方面的说明，见上述第 5 问的回答）

再说争取释放被捕工人、要求严惩警察这两个目标，在现行专制统治下可用手段并不多，无非是扩大舆论、寻求律师介入、争取社会各界广大群众关注，而且应当注意分寸，避免在群众基础尚不足时作出过于突出的行为举动挑动刺激统治者的敏感神经。佳士运动一开始曾经得到过全国各地的民间泛左翼、泛自由主义群体、劳工界和其他社运人士的广泛声援（2018 年 7 月底-8 月初），本来应该更坚守以舆论声援为主，当时舆论很明显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因为全国大部分群众都不知道（很讽刺的是全国大部分群众是通过官方 8.24 清场当晚的新华社等大型媒体的批判才知道有佳士这回事，彼时舆论主动权已经掌握在官方的手里了，佳士运动能活动的骨干一时间全部被压制、直到第 6 天---8 月 30 日才出现一系列反击文章，这远远不如 2015

年 12.3 劳工 NGO 舆论自卫反击斗争，当时劳工自媒体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官媒之前就抓住事件中的舆论主动权，并在 12.22 中央官媒集中抹黑的当天就发动大胆猛烈的舆论反击，之后相关自媒体和相关话题讨论都没有被封杀，反而为事件赢得了更多舆论空间）。

所以，为了争取释放被捕工人、要求严惩警察，舆论斗争本来大有可为。也正是舆论斗争最能够成为“寻求可能的力量联合”的方式，因为各派力量都可以写文章扩散声援（当时微信群和自媒体控制已经开始收紧、但还远远没有 8.24 清场前后那么严厉）。

但佳士运动把太多精力集中在这些事上：发动线下声援团递交一些自以为很有用其实屁用没有的、且极度恶臭的跪拜党中央的媚上文章（倒是起到了让很多民间左翼和泛自由主义群体不再积极支持运动的作用）、发动线下声援团到商业广场或公园里去做一些高唱红歌的政治集会、沉浸在街头集体表演中把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围观路人当做要重点争取团结的工人阶级群众——这些街头集体活动和政治宣示正是典型的“挑动刺激统治者敏感神经”之举，不晚于 8 月中旬官方越来越频繁派人干扰、公开冲击和制止这些活动，就可见这些活动在统治者眼中有多敏感。关键是这些举动除了“挑动刺激统治者敏感神经”和吸引了一些外部政治炒作之外，并没有起到争取更多国内进步群众的作用，反而由于一面倒向极度恶臭的国家主义保皇政治论调而让不少进步群众与这场运动拉开了距离。

<11>佳士运动积极分子的动员里有大量的道德绑架——以道德、立场质问或指责来逼迫所有同情者全力声援，例如指责不积极响应、没有转发他们的推送的人就是立场有问题，例如指责“只批评不行动就是立场有问题”，甚至指责一些老左派不去现场声援、为此找理由“死了以后有何脸面去见毛主席”，甚至还用“无耻下流、唱衰工人斗争”这样的道德谩骂来回应左翼同路人的路线批评（均有据可查）。

而且，佳士运动众多积极分子不分场合、不分群组的主题甚至正在讨论什么话题一概群发其运动文宣推送，对他人劝说沟通却一律不予理会，当时在微信上众多的工友群、左翼群、女权话题群、反性骚扰群至少数千人都见识了佳士运动在宣传时这一显著特点。

这些行为反映了佳士运动存在哪些问题？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这些行为都反映了佳士运动核心骨干分子有着极度的自负、狂妄自大和自我中心主义，他们认为他们所领导的佳士运动如此英勇、杰出、声势壮大、众望所归，当然是当前全国一切群众斗争和社会进步运动的不容置疑的中心，全国所有左翼、各类维权、各类社运、各追求进步者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地、无论正在做什么，当看到佳士运动声援团发出的任何指示和号召时，都有义务第一时间阅读、学习领会、无条件支持、响应、转发、立刻奋不顾身行动实践，如果竟然

有人没有做到这个天命所归的基本义务，那一定是思想有问题、立场有问题。

具体来看“道德绑架”，很可能是佳士运动主导组织原有的组织特点。据“佳士工人声援团”官网发布的贺鹏超认罪视频文字版，贺鹏超说过这样一番话：

「我们这个组织也认为，学习是搞资产阶级学术，学了就是注重自己的私利，（讽刺不屑的语气）不愿意奉献，用这样的道德绑架让学生们放弃自己的个人前途呀，自己的个人私利，甚至家庭，爱情。

「而且这个组织还有一点，个人的恋爱情况也要汇报，不允许和组织外的人谈恋爱，谈了也要分手，即使是组织内的人，也要经过组织审查，向组织汇报，聊天内容不能避开组织，没有一点自己个人的隐私。」

另一个青鹰社成员侯长珊在认罪视频中说道：「我从小和我的家人感情特别好，但是组织说，家庭是什么封建束缚，亲情是面具，实际上有利益的考量。感情上我才是一个最大的受害者（哭了），我和我的男朋友就是因为他们才分手的，当时贺鹏超逼着我给李仁钦（前男友）发短信，在旁边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我输，“永无复合可能，再不见面”，说要彻底批倒批臭他这个投机分子。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与上述“道德绑架”类似，众多积极分子（他们未必都是能做出决策的核心骨干分子）不分场合、不分群组的主题或讨论话题一概群发运动文宣推送，很可能也是他们固有的组织特点决定的：他们早已习惯了“立即无条件群发声援团统一的推送”，恐怕既不会有讨论，也不会有反馈，有反馈也没多大用，因为众多微信群里很多人早就批评过佳士积极分子这种不顾一切的群发推送，却很少有改观。

这些行为——虽然说是细节，但属于很能说明问题的细节，反映了佳士运动的多数积极分子是多么脱离群众。他们看起来就像一个高度封闭的官僚机器，旁观群众一直搞不清究竟该对谁反馈意见才会有效果，看似被捧得很高的积极分子例如沈梦雨、顾佳悦、郑永明、岳昕等人实际上根本无法成为运动本身与其他热心声援群众之间的纽带，因为众人很快发现找这些明星人物反馈意见一点用都没有，他们背后的那个主导组织根本就没有打算与任何群众对话、连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多少有所回应的迹象都没有。

至于说可能的原因是什么，一是上面提到的既定组织结构有可能就是排除群众反馈的；二是从侧面说明了佳士运动的不少核心骨干分子在本质上是精英自大心态深入骨髓、与工人阶级有相当遥远心理距离的小资知识分子；三是说明佳士运动多数积极分子对待其他左翼、社会活动者普遍有着不加掩饰的**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心态**，把其他左翼、社会活动者及其交流平台当做自家的无条件的宣传工具，这种实用主义

心态不止是狂妄所致，还可以更远地追溯到毛泽东思想及毛党运动传统里的实用主义政治取向——这也是非常值得今后的更为严肃的左翼政治实践者深入批评、反思的。

<12>佳士运动不顾一切批评质疑的这种强势的特点，能否说是因为形势紧急所迫，而非组织本身的问题？

如果是组织本身问题所致，那么左翼组织如何在维持活动与决策高效的同时，避免官僚集权乃至民主氛围的丧失？

这恐怕还不单单是“形势紧迫”时的问题，北马系这种高度集权的组织与决策模式，不是在形势紧迫时才形成，而是在日常工作中形成的。北马社团的红火发展，似乎也要部分归功于这种组织模式带来的效益。那么就应该提出更进一步的问题：左翼组织如何在维持活动与决策高效的同时，避免官僚集权乃至民主氛围的丧失？一套合理的议事、执行的组织规范应当被提出。

说到北马系社团的红火发展，这似乎也会是领导者盲目自信的来源之一。而这类社团的高效运作，如前所述似乎更归功于组织氛围的带动，而不是成员真正建立了充分的理论认识、具备了理性判断与讨论的能力。从部分马会成员后来的转向（发自内心认同体制）来看，他们之前的“无产阶级立场”只是建立在组织规训和朴素情感的基础上，而

不是真正地理解并认同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成员培养方式似乎也进一步巩固了不良的组织议事氛围。

但另一方面，如果善于理论且热衷实干的骨干不够，又不想降低新成员的理论培养水平，那该如何扩大组织规模、维持组织活力呢？应该提出更合理高效的成员培养模式。

培养、议事、执行……一系列的组织问题，影响了他们的形势判断、路线制定、策略选择与对外互动，导致了佳士运动的大失败，其他的“大佬因素”只是推波助澜、火上浇油。而且这些组织问题也不是北马系独有，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避免之后更多的左翼组织重蹈覆辙。

<13>深圳坪山青鹰社主要负责人贺鹏超的全面招供之后大量活动骨干很快被捕、佳士运动迅速走向终结，说明了什么？

综合各方早已公开发布的信息：贺鹏超，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学院2007级本科生，北大物理学博士，在校期间参与了中国第一家高校登山社团——北大“山鹰社”，在担任社长组织过多次在青海、四川五、六千米高峰的登顶活动，并带领山鹰社获得过北京大学“通令嘉奖”，贺鹏超还组织山鹰社2010年成功承办全国高校攀石邀请赛，

更作为山鹰社代表先后受到温家宝和李克强两任总理的亲切接见，在校期间贺鹏超还参与了由几十个专业院系学科的几百名本硕博学生组成的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协会，后来更是卸任山鹰社社长，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在北大马会的活动。据称，贺鹏超也大力参与了张云帆任会长时北大马会领导组织的“北大后勤工人调研报告”（据该报告自称，有 19 个专业院系的 61 名本硕博学生参与了调研，2015 年底发布）。

毕业后不久，贺鹏超和其他志同道合的毕业生南下深圳于 2017 年 2 月创立了公益组织青鹰梦工场（深圳市坪山区青鹰青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简称青鹰社），服务外来务工青年及其家庭。“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人才发起成立服务工人公益组织”很快引起官方舆论的关注和赞赏，从媒体报道和后来贺鹏超等人被捕后一些工友的回忆来看青鹰社确实在服务工人方面有不少真诚努力、创新的贡献。2017 年 9 月环球网的报道中，成立不过半年的青鹰社仅 10 名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已经取得诸多公益成绩：“除了书法课，这里还提供吉他、写作、话剧、舞蹈、电脑等课程，已经服务近 300 人”，“帮助数百名青工树立了积极健康的交友观、恋爱观，同时也帮助其中的一些人找到了人生的另一半”。2018 年 11 月“北大失联校友关注团”声援贺鹏超的文章称：青鹰社“2017 年成立以来开展了青少年服务共 300 余场，服务坪山青少年 10000 余人次”。也正是在 2017 年 9 月环球网报道后，深圳从区一级到街道办各级基层领导纷纷“到访青鹰社考察”，

青鹰社的自媒体账号也不遗余力地发布了一篇篇大半年以来各级基层领导“考察调研”“社会治理工作交流”的文宣（主要在2017年9月到2018年7月间）。

然而只看到上述充满公益光环的媒体报道和支持者高度评价的人们很难想象，后来的事实是青鹰社创始人贺鹏超在2018年11月9日被捕后很快就写下了长达80页的认罪供述坦白材料（不晚于12月初），不仅自己认罪，还在供述书里劝告其他同路人坦白从宽，供述内容更详细到哪年哪月哪日开过哪些会议、某次会议上某人说了什么话、什么表情都描述了出来（据看过供述书的圈内人士亲述），贺鹏超写下长篇供述后，北大、人大等高校的左翼社团主要积极分子被捕，社团被“改组”，深圳微工汇成员相继被捕，全国多地众多与他们有关联或者只是有过交往的人被带去派出所调查；当局把贺鹏超的长篇供述书发送给全国多地派出所、打印传阅给当时被带到派出所的相关人员，以作为最佳的劝降材料；在贺鹏超被捕后第二个月官方制作了贺鹏超、王相宜、侯长珊、郑时友、宗扬、郑依然6人（前3人为青鹰社成员）的认罪悔过视频，组织北京各高校进步社团的部分成员集中观看。在贺鹏超被捕后第三个月，佳士运动在有组织运动层面基本结束，只剩下零星的个别社团和少数人活动（2019年1月中），连其他非毛派的多家劳工NGO人士都疑似被牵连、集中被捕。

很显然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上述“深圳坪山青鹰社主要负责人贺鹏超的全面招供之后大量活动骨干很快被捕、佳士运动迅速走向终结”的事实，说明**贺鹏超对其政治事业和组织的叛变是直接导致佳士运动失败的重大原因之一**。而且他被捕后并没多久（据说并没有遭到某些人脑补的什么刑讯逼供）就写下了详细到令人惊叹的长篇供述书，也说明了这位佳士运动最核心的骨干分子在政治上是多么的脆弱不堪，也反映了这场运动的内核异常脆弱的一面。

但是更加让人惊奇的是，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人公开谴责贺鹏超的性质如此严重、恶劣的叛徒行为，反而有圈内所谓的前辈极力为贺鹏超的叛徒行为**辩解、开脱**，这更加的耐人寻味——2019年2月2日李明骐发表的一篇代表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的文章里这样写道：

「对于狱中同志是如何以及怎样“认罪”的，在“认罪”前后受到了哪些威逼利诱，我们现在无从得知。只能等待将来这些同志被释放后，逐步了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红色中国网工作组的看法是，现在并非革命战争年代，有志于马列毛主义的青年积极分子，也并非正式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成员，既不受组织纪律的约束，也不受纲领和誓言的约束，只受工作道德的约束。因此，不宜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现在的青年同志。即使不考虑刑讯逼供的情况，由于对方掌握专业的审讯手段和技术，由于青年同志被捕时势必被对方缴获大量的实物证据（电脑、手机、通讯记录等），由于初次被捕的

青年同志缺乏经验，由于对方有条件反复比对、分析大量被捕同志的口供，绝大多数被捕同志往往在入狱后的最初几天就难免被对方“突破”。……对于已经被捕并且在狱中说了错话、办了错事的同志，我们认为，只要他们不是主动卖身投靠，而是在某种被迫的情况下委屈求全，或者是因为缺乏经验而泄露了其他同志的情况，只要在出狱后能够主动向左派同志把情况说清楚，自己在主观上又没有心灰意冷，而是能够坚持理想，那么就还是我们的同志，还是我们的战友。」

李明骥还特意推荐了被他公开捧为“在马列毛主义的队伍中已经奋斗了二十多年，有着相当的理论素养和最丰富的实践经验，经历和处理过各种复杂情况，是中国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的第一流实践家”的张耀祖先生也共有的观点，来证明为叛徒出卖行为辩护是有合理正当依据的：

「这个态度，我们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在去年 8 月份严元章、远航一号致顾佳悦同志的信中就已经表达了……严元章、远航一号还特别指出，一旦入狱，要实事求是，要允许同志犯错误，不要轻易给其他同志扣上叛徒的帽子，要允许犯错误的同志继续革命。」

可是无论为叛徒做多少辩护，叛徒仍是叛徒，辩护者只是自取其辱。这种极力为叛徒辩护的言论出自自以为倚仗着“已经奋斗了二十多年，有着相当的理论素养和最丰富的实践经验，经历和处理过各种复杂情

况，是中国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的“第一流实践家”的毛派左翼大佬，代表着有影响力的左派团体发出来，这本身就说明了当这个历史阶段临近尾声时，左翼穷途末路自甘堕落的惨象。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什么贺鹏超被捕后很快做出如此重大的叛卖，为什么在 2018-2019 中国左翼圈里几乎没有人公开揭露批评叛徒行为、反而有左派团队集体竭力为叛徒辩护开脱，这些事其实都是有联系的——至少从 2017 年的 11.15 广工读书会事件公之于众开始的新一波左翼运动，中国左翼就几乎完全忽略活动分子被捕后可能无底线妥协的问题、一味只是吹捧拔高活动分子（只有个别人贴出革命前辈经验记录提示过“一个革命者被捕时怎么办？”），而且反而还有左派权威大佬把这个问题模糊化为“可以妥协，但绝不屈从”的笼统说法，却不讲清楚“妥协”的底线、与“屈从”的边界何在，如果“妥协”导致了更多人被追究、惩戒呢？恰好，当初把这个问题模糊笼统化的大佬就是被李明骥捧为“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流实践家”的张耀祖，他同时也是“八青年”事件的政治领导者、佳士运动联名信动员时站在最前列的老左代表。

佳士运动中，从 7.27 到 8.24、11.9 大抓捕一轮又一轮，当局抓了放、放了抓，过去经历过这种情况的活动分子或者与这种活动分子接触过的人不难知道，当局每次抓人都会想方设法从被捕者口中得知尽可能多的情况，甚至会突破一些不坚定或有个人弱点的活动分子、胁迫他

们在暂时获释后充当线人为警方搜集情报，实际上在 2017 年 11.15 广工读书会事件中，八青之一叶建科的供述中就透露了当时为了早点获取自由，答应了警方胁迫做线人；最先公开在网上的张云帆的自白书里也承认：

「我还被要求承认自己有“极端思想”，保证以后再也不参加读书会，被要求“供出”更多有相同思想的人。……当被告知更多的人会因我被抓捕，父母会被连累的时候，我承认，我没能顶住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只想快点了结，哪怕自己进监狱，只要能让其他青年和家人得到安宁。所以，我妥协了。」

不过，比起佳士运动后来一轮又一轮抓了放、放了抓、众多积极分子几进几出派出所的情况，八青里有过的这些“妥协”“供认”只是一个开端。可以合理推想，早在贺鹏超 2018 年 11 月 9 日被捕之前，佳士运动里已经有过其他积极分子被警方获取了很多可以被进一步顺藤摸瓜的人际关系、组织内部情况。更已知在 8.24 清场时，警方就扣押过深圳佳士声援团成员及北京的时代先锋网多名成员和红色中国网办公室的手机、电脑、文件等包含大量信息的数据设备。在警方早已掌握大量人际关系和事件细节的情况下，只要在讯问中抖落一些重要细节、再略施一些心理战术（安抚、关怀、恐吓、暗示、谎言），就可以攻破很多从未直面过安全机关的年轻人的心理防线。

上述这些重大情况，说明了几个互有联系的结论：

第一，判断一个左翼活动分子是否经得起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考验，尤其是能否经得起国家强力机关的压迫，是否具有高学历或高智商、组织工人调研或一般服务工人活动经验、组织学生社团或一般户外探险团体的经验、建立社工组织和与各级官僚打交道的经验——这些都关系不大，即使这些条件和经验都有也仍然未必靠谱，还是要有过一轮直面国家机器或资方爪牙的暴力压迫、既没有低头妥协也可以确证没有出卖他人的经验，才有可能担当进一步的斗争重任，由这样经过严酷考验的左翼活动分子领导的战斗团体才是真正值得信任的。

第二，即使假设在上述第一条完全成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假设都由经过实战考验的左翼活动分子组成了一个政治团体），在目前监控手段无孔不入的专制政权下，由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治组织来领导一场公开的群众抗争，是完全行不通的。

虽然佳士运动的核心骨干分子对于“最危险的地方也最安全”这条辩证法则大概有着相当机灵的理解——青鹰社一开始就极力构建着合法的外衣：大张旗鼓合法注册、用温和的公益词汇来掩藏激进政治意图、积极欢迎官方媒体公开报道、积极欢迎各级政府领导莅临考察、组建党支部向党组织紧密靠拢，但是青鹰社、贺鹏超等人显然过于迷信这种合法包装的障眼法效力，从佳士运动激烈升级期间（2018年

7-8月)贺鹏超竟然亲自用个人微信(网名“大江流”)在多个微信群里口无遮拦与其他网友争辩这种让人不可思议匪夷所思的政治奇观,就可窥见佳士运动核心骨干分子对于自身安全有着病态的“迷之自信”、几乎没有任何保密意识可言。

对于上述奇怪的现象,还有一种理解是:青鹰社贺鹏超等佳士运动核心骨干分子当真相信从地方到中央的统治集团各层级确实存在着“两条路线、两种势力的斗争”,即更亲资本主义的“黑恶势力”“腐败势力”的右翼路线与更主张回归群众工作的“健康势力”的左翼路线,相信统治集团即使面临来自底层势力的对抗性、颠覆性的行动威胁也会依然陷于“路线斗争”。北大博士贺鹏超等少数核心骨干分子对上层精英的精神亲近,可能使得他们对这种在很多民间左翼看来根本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有着更多的信心,也就使得他们更放心地在网络上活动而没有采取充分的保密措施。

第三,在现有的专制政权没有大的削弱或放松管制的情况下,也就是政治统治者大大强于民间进步力量的力量对比情况下,人为发起的具有政治对抗性的群众斗争,顶多能在付出惨重牺牲代价的同时争取一些群众的支持和同情、以及实现要求释放被捕活动分子之类的防卫性要求,但无法实现进取性的要求:例如要求组建起不受官方控制的工会、或组建起包含已经公开显示出对抗性的工人积极分子的工会、要求国家暴力机关“严惩”自己的成员、或要求国家行政机关“为民惩

办”自己的负责官员——国家要能在群众斗争面前答应这些要求并照办，除非说明现行专制统治距离倒台也已经不远了。然而这与当时的现实情况相距甚远。

也许佳士运动核心骨干分子直到第三轮镇压的 **11.9** 大抓捕前仍在做着“联合党中央的健康势力反对腐败势力、黑恶势力”梦，所以才会在 **10月9日** 发文把当天深圳市委政法委书记李华楠落马称为“我们相信，此番李华楠的落马正是佳仕工人声援团坚持斗争的成果之一！”又在 **10月23日** 发文“评李华楠落马再致中央纪检委、政法委”，批评“广东省政法委的相关领导不肯对李华楠的腐败行为进行彻底调查、不肯回应声援团提出的质疑、不肯对佳士维权工人受到的非法对待予以纠正”——而把这些期望寄托给中央纪检委、政法委。（均有据可查）

<14>佳士运动为什么在一轮又一轮镇压之下仍向前走了半年之久（从 **2018年7月中旬** 到 **2019年1月中旬**，整整半年保持着前进的状态）？这其中的动力是否有什么正面经验？教训何在？

从近二十年的斗争来看，一场具有强烈对抗性的斗争能持续半年已经算是比较久了。坦率地说这总体上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结果（稍后再

说)，本来也不值得大举鼓吹，但其中确实也有一些较为成功的战术，可不吝略记一二：

其一，充分利用了既有的一些合法的权利：例如做好每一步投诉（均索取回执）、申请组建工会、维护在校内组织社团的权利、维护社团在校内继续组织公益活动的权利，从而更能够公开主张这些权利、让相继而起的声援显得更为合情合理，更能赢得群众的同情和支持。

其二，**7.27** 和 **8.24** 之后声援团集中发布获释的工人和学生揭露基层国家暴力机关各种威逼迫害诱导说话的文章、视频等，在 **11.9** 抓捕后也有获释的工人通过声援团网站发文“翻供”、揭露基层国家暴力机关的逼迫认罪和胁迫其指控其他工人积极分子的恶行，这些举动大为损害了统治者在民众面前精心制造的伪善面目，大为增加了佳士运动的道义力量。

（但是我们不清楚声援团这样做时，是否充分尊重了这些揭露者的自愿；即使做出的是能促进斗争的行为，也必须尊重揭露者的自愿，因为揭露者还得承担很大代价和风险，例如丢掉工作、再次被抓和遭到更严厉惩戒，在 **2018** 年 **11** 月大抓捕中就有一位叫做李元柱的广州日弘厂工友揭露了广州警方此前的威逼诱导的审讯，之后被资方开除、并被警察突袭强制扭送派出所）

但佳士运动里不多的这些正面经验也同时紧跟着教训：虽然充分利用了合法权利的好处，但又有很多时候过于迷信、依赖合法手段，有时不但毫无“阶级觉悟”可言，甚至到了让人难堪、羞耻的程度（例如佳士工人积极分子7月底在燕子岭派出所门口集会时手挽着手反复高喊“人民警察爱人民”，苦苦哀求统治阶级的国家暴力机器站到被统治者立场上）；

而在揭露国家暴力机关威逼利诱黑幕时，声援团是否尊重了当事人工友和学生的意愿，尤其是否对工友做这样揭露斗争的损失和后续援助尽到了责任，至今都是问题。

话说回来，如前所说，佳士运动之所以能持续向前走了半年之久，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除非专制政权倒台或至少受到重大削弱、使得社会上得以重新出现群众组织，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不可能再出现佳士运动这样的运动，所有人包括仍然打算大力赞美“佳士运动成功经验”的人，至少应该知道佳士运动的“经验”有着以下如此昂贵的条件：

1、合法存在着一大批有着学生自发活力的高校进步左翼社团——这是从2011年前后出现的新气象，在2018年声援佳士斗争的学生运动被镇压之后，现行统治集团不可能再允许这种新气象出现了。这些学生社团苦心经营了数年之久（其中北大马会应该有二十年以上历史了），培养了数十或近百积极骨干力量，才有了2018年能向前走

了半年的工学连结运动和学生运动（却也只消半年折腾就全军覆没了）。

2、在广东合法存在着一批能够培养工学结合积极分子或带动左翼青年靠拢工人的据点，例如坪山的青鹰社（2017-2018），龙华的清湖学堂（2012-2019），微工汇/新生代（2010-2019），广州的木棉社（2013-2019），这些辛苦经营了数年之久、有的是十分优秀杰出的工学积极分子投入了大半青春岁月经营的机构，是这众多难能可贵的优秀骨干和组织机构的投入，才有了佳士运动能向前走了半年的成绩。但在 2018-2019 镇压佳士运动及扩大化的镇压中，这些力量大部分也全军覆没了。

B.政治原则问题（立场问题）

<15>佳士运动无原则默认、接纳各派政治解读——尤其 **2018 年 8 月**以来，在声援团的大量向上呼吁的文宣里都充满了拥党爱国的官腔官调，乃至用这种观点指控一个把佳士运动与八九六四相提并论的声援者（郑某斌）是奸细，同时却又在声援团官网无任何说明地转载海外自由主义媒体和一些激进反对派媒体对运动的报道，而这些媒体当时多次明确指出佳士运动是对习近平统治的根本挑战（比如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以及激进反对派组织 **CWI** 的中文网站），佳士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潘毅教授更是从 **2018 年 8 月中旬**开始在英国广播

公司、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等一些国际主流媒体高亢地拔高鼓吹佳士运动“将开启中国社会变革的全新篇章”、“是早期共产党激进左翼运动传统在当代的真正复活”、“未来必然会对资本和权力发动强劲的挑战”，后来潘毅教授也把佳士运动与八九六四相提并论，并且公开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去让那些广泛支持、参与六四的人来声援这些孤立的学生”。

为什么佳士运动无原则默认、接纳各派政治解读？是否扩大了宣传、争取到了更多人的积极支持和声援？实际效果是什么？其中有什么教训？

答：佳士运动无原则默认、接纳各派政治解读可能有这两个原因：首先是为了扩大宣传，争取不同政治思想所影响的群众的支持；再则，佳士运动本身是几个不同的泛左翼群体在短时间里的临时拼凑组合（参见前述第 8 问的第 4 个观点的解答），本来就有一些重大的不同政见，例如对于把佳士运动与八九六四相提并论的说法，老左派是根本反对的，但潘毅本人却是属于自由民主派的左翼（或者至少是从民主派转变过来的）、是支持的，社团学生毛派的想法则不明朗，所以佳士运动会表现出不同观点的冲突。

正如前面说过的，首先是拥党爱国的官腔官调引起了很多民间左翼和泛自由主义群体的反感，当声援团抵制一切批评质疑后，这些群体在 2018 年 8 月上中旬就已经开始渐行渐远（见前述第 4 问）；从 8.6

政治集会开始，乌有系的老左（如范景刚、张勤德等人）开始真正活跃起来，但这些一直鼓吹“保党救国”的职业政治投机专家很快就嗅到佳士运动引“狼”入室风向渐变的气味，果然，这些老左眼中的“推墙党”很快就祭出了“佳士工潮启示录：毛左对习近平构成挑战”这样的标题向全世界广而告之（2018年8月21日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于是，8月18日乌有系还在网站首页置顶的公告“乌有之乡拟于近期联系深圳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联合举办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活动，欢迎感兴趣者给以关注和支持，欢迎历代深圳建设者和关心者参加这次活动”，之后就迟迟没有下文了。

实际上佳士运动得到的国内关注和国外关注（或者说墙内关注和墙外关注）最初一个多月都在发展，只是国外或墙外关注扩散更广（直接因为国外舆论自由得多），但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是内外关注程度很不平衡的。还在2018年8月中旬时，首先因为佳士运动无原则的和混乱的政治舆论表现，先后驱逐了很多民间左翼和泛自由主义人群，后来乌有系的老左也抽身离场了，然后由于佳士声援者在舆论斗争方面的严重欠缺（见前述第10问的解析），8.24之后更是冷场了好几天，舆论主动权基本掌握在官方媒体手中，随后国内关注很快开始下降，直到9月下旬北大马会打响了社团保卫战才再度出现舆论焦点。但在8.24之后，佳士运动的舆论重心开始转到了墙外的推特、电报和转发外媒宣传上，以后越来越倚重这种墙外的宣传，从那时起直到2019年佳士运动都是墙内关注远远少于墙外关注。

墙内关注之所以远少于墙外关注，当然有消息封杀的原因，但更重要原因在于 **8.24** 之前的那一个月，佳士运动在政治舆论上的无原则和混乱表现、以及无视所有人批评劝告的态度，使得它在 **8.24** 之前就已经开始失去相当部分群众的热心支持了。（如果把墙内关注不足只归结于消息封杀，那么如何解释到了 2019 年 3-4 月时声援微工汇被捕人士时依然动员了很多热心群众的关注支持呢？（当时甚至有过百尘肺病工人以联名请愿行动、集体上访行动声援被捕的微工汇维权工作者。）2019 年全年的消息封杀力度都要强过 2018 年，为何还有不少工人和活动人士冒着风险也声援微工汇的劳工活动人士呢？那是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微工汇多年来悉心发展的工人群众基础显示了生命力，这是临时拼凑组合而其核心主导者又独断专行狂妄自大、无视群众呼声的佳士运动早已经自行抛弃的。）

所以，佳士运动无原则默认、接纳各派政治解读，对于将来的斗争（当然应该会是很久以后了），有着什么教训呢？相信有斗争实践者总能就此思考很多，这里只说两点抛砖引玉：

如果有着不同政见的势力临时组合起来进行斗争（这是许多群众斗争难免出现的情况），应该以一些具体的共同约定为基础（例如统一诉求、方法、约定行动禁忌），各种政治思想倾向的群众或者没有政治倾向的群众都可以为具体的斗争诉求呼吁，都可以各自解读，而不要

强行统一政治立场、牵强地宣告某种政治审查标准，更不要让某种政治解读垄断整个运动。

一个政治斗争想要得到持久的群众力量支持，就得有一定的原则，不同原则的政治实践在重要事件中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后果，而且后果会持续很久，不是说变就变的。例如“只要团结一切有利于工人运动的力量”与“只要团结拥党爱国的力量”就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原则，前者可以团结很广泛的各自认为支持社会进步的众多民间派别，后者却会赶走大部分的自认为支持社会进步的民间力量，乃至把一些激进的进步力量赶到对立面去。佳士运动在 2018 年 8 月一度决绝地否决一切对其支持国家主义言论的批评，在政治实践中成为“保党救国”的跟班，别说第二年 5 月潘毅试图唤起支持八九六四的群体的做法几乎不会有什么作用，就是再过若干年，都肯定还会有人用佳士运动这个重要案例来证明那些被过誉为“反国家主义的毛派”是多么不靠谱、因为他们到了斗争紧要关头就会出卖其“政治资本”（即对其有期望的支持者们）去跪拜国家主义的专制政权。

所以实质上佳士运动并不是到了 2018 年末或者 2019 年才丧失群众支持的，他们早在 2018 年 8.24 清场之前、在 8 月上旬和中旬就开始陆续丧失群众支持了，就因为佳士运动无原则的和混乱的政治实践表现，这应当成为佳士运动最深刻的政治教训。

<16>2018年7月29日沈梦雨带领的线下声援团在坪山燕子岭派出所旁的小广场聚集示威时就集体打出了毛泽东画像，随后《亚洲周刊》采访时，受访的声援团成员被说成“都是认同毛泽东”。声援团为何把所有成员都包装成毛左？

从实践看这是否有利于声援活动？其中教训是什么？

这个问题可以视为继续对上一个问题（见第15个问答）的进一步的具体讨论，除了上面已经说过的，这里还可以有所补充说明。

首先说事实，并非所有声援团成员都一致理解认同毛泽东，比如有运动参与者告诉过笔者，他是在无政府主义的意义上认同毛泽东，而并非一般毛派意义的理解，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从自己的理解来赞同毛泽东，并非马列毛主义者；还有的参与者是不过十几岁、仅仅因为佳士运动的出现才积极投身政治活动的左翼青年，之前对马列毛都没有多少真正的认识。当然，有些政治实践者会认为这种“水面下的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佳士运动早已做成了浮在水面上的众所周知的“一场毛派运动”的政治事实。不管重不重要，总得有人说出“水面”下的事实真相，将来也总会有更加认真严肃的左翼运动实践者想要追问“水面”下的历史事实，这正是本篇问答要努力呈现的。

当然本篇问答始终更着重留下一份面向未来的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实际又怎样？教训何在？

显然，声援团极大高估了毛派这一招牌将能够得到的政治支持：包括可能的“党内健康势力”的支持（这其中是极大的政治幻想）、民间左翼群众的支持、国内外的左翼支持。而且声援团本身就有强烈的实用主义政治特点（见前面第 11 问对佳士运动大量道德绑架行为的回答），为了实现他们心目中有着极大能量的毛派政治支持，把声援团成员都说成是毛派就不难想见了。

然而实际上，集体举毛像的做法在此后并没有显示出为运动争取到更多的支持者，反而引起了非左翼的人群的疑虑和警觉。当然这还不算太糟，更糟的是在后面：大张旗鼓发动几十名声援者集体递交一些自以为很有用其实屁用没有的、且极度恶臭的跪拜党中央的媚上文章、发动几十名声援者到商业广场或公园里去做一些高唱红歌的政治集会、或沉浸在街头集体表演中把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围观路人当做要重点争取团结的工人阶级群众，用这些正面实际意义微乎其微的政治集会一再猛烈冲击统治者已经很脆弱的政治神经，使得这场 7.29 开始的“毛派声援运动”在不到一个月的 8.24 被冲散、再无可能返回深圳坪山重新开展斗争。

教训在前面已经总结过，简单说就是：这样一场公开的群众斗争应约定基本的行为准则共识，而不是一时地强求政治立场的统一（参见前面第 15 问），更不是把主要精力投入在那些充满政治幻想的、几乎无用的、只会招致加速覆灭的极端幼稚且极端愚蠢的政治表演。

<17>当时左翼自由主义学者陈纯的文章《左翼青年与“反国家主义联盟”》提及有左翼告知他“新一代的毛左确实和老毛左不太一样，新一代对中共已经彻底幻灭，对工人以外的其他弱势群体的利益也有明确的认同，这就是为什么毛左青年会宣称自己是‘反国家主义者’，还会积极地参与#MeToo 行动”（此文 2018.8.13 发表在端传媒）。但是从佳士运动来看，在斗争关键时刻，青年毛左的大量向上呼吁文件都充满了拥党爱国的官腔官调，而且不限于文宣，还用拥党爱国的观点排斥其他激进左翼、斥责把佳士运动与八九六四相提并论的声援者是奸细并且全网通报驱逐，在现场与老左派的代表人物张勤德、范景刚等人密切互动（孔庆东也发来了热情洋溢的祝福寄语），让人迷惑。

所以，新一代毛左真的与老毛左切割清楚了吗？那么陈纯所引用的左翼人士所说的是事实吗？佳士运动中的这些实际政治表现又说明了什么？这些实际政治表现的后果是什么？

显然，如上所列举的政治表现，这些 **2010-2013** 以来出现的新一代毛左实际上远远没有与老毛左切割清楚。其实，这种局面是从广工读书会“八青年”事件发酵为以网络声援为形式的舆论斗争事件时就开始形成的，正如李明骐后来在文章中公开透露的：在“张云帆等四人被取保候审后，又联络曾经在第一封公开信上联署的左右派知识分子，希望他们继续呼吁当局撤销对他们的‘取保候审’措施……在张云帆等四处碰壁以后，他们先是与正在北京的左向前同志取得了联系；经左介绍，由青鹰社的主要负责人面见严元章同志（严元章同志当时并不知道来人就是青鹰社负责人，来者用的是化名，但表示可以代表‘八青年’）。在那次谈话中，严元章同志提出了分三步走的斗争策略。……上述斗争方案确定后，在北京的‘八青年’代表也赞同。随后，便开始了全面宣传‘八青年’的工作。这项工作，是从张云帆的‘我的自白书’发表开始的。这份‘我的自白书’在发表之前，曾经严元章同志多次修改。”（这段引文出自《严元章同志与“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2019.1.5** 发布在红色中国网）——李明骐所说的“严元章同志”，正是“曾在巍巍生前，为他做私人助理工作十年……曾先后创办了中国工人网、红色中国网、《红色参考》杂志和红色中国出版社”的张耀祖（此段引号里的内容引自张耀祖声援广州八青年文章 **2018-1-22 21:54** 发表在红色中国网时后附的“作者简介”）。历经多年的张耀祖，实际上已成了相当部分老左派的代表人物（在佳士运动联名书上带头的一些老工人、老党员就是张耀祖所带动，见前述第 8 个问答里的第 4 个观点讨论）。

所以，早在佳士运动这新一波左翼运动的肇始——“八青年”事件时，老左派就把握了一部分政治领导权，或者更深入细致地说，青年毛派与老左派形成了暂时的政治结盟关系。按照毛派一贯的实用主义逻辑来看，当时青年毛派利用着老左派的政治合法性庇护、资金帮助，也不再从理论和政治上批评老左派（一名前青年毛派积极分子告诉本文笔者，“八青年”过去的公众号曾经发文批判老左派，但这种说法已经难以找到证据，严厉的网络封杀使得很多左翼公众号早已不复存在），同时，青年毛派也打着自己的政治算盘。

其中，老左派的资金力量加上毛派一贯的政治实用主义逻辑，使得老左派持续多年对主流毛派的牵制影响一再奏效。用张耀祖九年前对《南风窗》记者所说的话，「“老同志捐款很重要，他们的退休金、离休金很高。”张耀祖说，“一个月拿出一两千就不错了。老同志多啊，中国这种老革命成千上万的。”」当年《南风窗》记者采访到当时的著名老左派、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就自称：自己一年的捐助总额可能达到两三万元，“但据他的司机罗卫兵估计，这个数额可能还要大一些”。（此段引自《“左派老人”李成瑞》，作者章剑锋，2010.6.29 载于《南风窗》）

那么，陈纯所引用的左翼人士所说的新一代毛左与老左派不太一样、对中共已经彻底幻灭是事实吗？一半是事实，一半不是事实。从思想

理论来说是事实，从实际政治上说还不是事实。实际政治不同于思想理论，实际政治意味着在一些条件、组织和行动、力量对比下所采取的实际行为及其所发生的影响以及相应的认识、行为。一个从思想理论上认识到中共已经无法自救、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扭转局面的人，由于缺乏必要的组织或行动独立性、加上毛派一贯从来不反思的极端实用主义地**过度迷信**主流官方政治**话术**（同时极度低估这种**话术**的反动性给群众所造成的反感、抵制），仍然可能在实际政治中跟着机会主义跑、去做出一些实际上表现着政治幻想的行为。具体就佳士运动的实际政治表现来说，不能否认其中很多青年毛派确实早已和老左派不同、对中共彻底幻灭、反对国家主义，但是要害在于，这些佳士运动青年毛派在当真投入公开的政治斗争实践时（从**2017**年底“八青年”事件开始）就实用主义地与老左派紧密勾搭在一起了，而那些大佬级别的老左派（比如退休高干、著名活动分子、知名老党员等）从思想到政治到物质生活来源都属于统治阶级一部分，**2018**年青年毛派开展活动的很多经费（当然不是全部但确实有一部分）直接来自这些与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老左派，从放弃对老左派的批评（如果说以前真有所谓批评的话）开始，青年毛派就已经放弃了政治原则。政治堕落是从这里就开始了的。从这个政治意义看，佳士运动只是八青年事件的进一步发展。

佳士运动实用主义地利用那些主流官方话术的实际政治后果就是，老左派的政治思想完全占据了佳士运动走向公开化的最初一个月

（2018年7月-8.24），也可以说很大程度地影响了佳士运动最主要的整个上半年（从2018年7月公开化到11.9大抓捕前后）；其他民间左翼、更不用说自由主义围观人群都失望淡去（当然佳士运动毛派的大力驱逐也“功不可没”，详见前述第4个问答）；完全看不出统治集团因为佳士运动使用了主流官方话术就网开一面，反而可以合理推测统治集团因为一场具有强烈对抗性、敏感刺激性的政治示威使用了本集团的话术（即统治集团眼中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而更加投鼠忌器、更欲除之而后快，从2018年7.29、8.24、11.9、12.26到2019.1月中一轮比一轮强硬的抓捕打击可以佐证。

所有投身政治活动的进步事业积极分子迟早都将明白这个常识性的基本道理：思想理论是一回事，实际政治表现和政治分析、政治认识又是另一回事，两者有关联但不能等同；思想理论正确，可以促进政治认识，但不能保证有正确的政治认识，更不能保证有符合本阶级利益的实际政治行为表现。但是佳士运动却是以相当惨重的且再也无法挽回的代价才告诉了左翼青年们这个常识性的道理，我们在沉重的叹息中应该深切领会这个常识性的道理，避免今后重蹈覆辙，而不只是沉重叹息。

<18>佳士运动从 **2018.7.29** 示威直至最后被镇压，始终反复宣示毛的画像、话语、马列毛主义的口号，这些宣示的动机是什么？效果如何？

除这些宣示之外，“马列毛主义”在佳士运动中究竟还有什么具体表现？如果说“马列毛主义”是一种政治主张、社会愿景，它究竟实际内涵是什么？（还是说暂时没有任何实际内容，仅仅只是倡导组建工会和工学结合，再加上重建臆想中的“毛时代乌托邦”？）

作为“毛派运动”的佳士运动的这种实际政治模糊性意味着什么？

如前所述，佳士运动的这些宣示都是基于这些青年毛派极大地高估了毛派从官方到民间的影响力，尤其是包含了对官方“党内健康势力”支持毛派的极大幻想，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支持真正社会主义的“党内健康势力”，民间毛派、左翼在现行相对稳定的统治秩序下也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见前述第 16 个问答）

有亲身参与过坪山线下声援团的左翼青年向笔者提出了这个问题：据他多日来的观察，并没有发现声援团成员有什么具体的毛派政治思想认识表现，这使得他非常困惑：佳士运动如果说不止是声援被捕工人、争取组建工会、要求“严惩”警察，而更是一场左翼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那么它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

或者说，佳士运动的“政治主张”暂时没有任何实际内容，仅仅只是倡导组建工会和工学结合，再加上重建臆想中的“毛时代乌托邦”？假如参与过佳士运动的众多 90 后、95 后甚至更年轻的左翼青年深入了解到毛时代并没有毛派所宣传的那么美妙，广大工人既没有政治自由权利更没有什么民主权力，罢工被镇压，任何有独立苗头的群众组织都被严打、取缔，文革中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小组大佬出尔反尔、先是支持后来又镇压了“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和“上海人民公社”等一些有独立自主倾向的大型造反派工人组织，成千上万造反派群众被毛泽东默许、林彪所控制的解放军和周恩来所控制的公安部所抓捕、监禁、杀戮，毛泽东政权还为了联美抗苏的实用主义目的不惜支持了屠杀众多工农群众的智利极右翼独裁的皮诺切特政权、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反革命政权、西班牙的佛朗哥法西斯政权和希腊的反革命法西斯军人政权，假如今天的左翼青年愿意认真了解这些历史事实、能够追求建立于真实而非神话的政治，那么一时包装打造的“佳士运动毛派”也将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历史现象，是政治思想上根本站不住脚的。

至于把佳士运动说成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左翼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或“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罕有的以共产主义为想象的工人-学生连结运动”，这些完全是个别掌握着话语权的网络平台和大佬一厢情愿的解读，或者说只是“话术”，与佳士运动跪求青天大老爷开恩的公开信一样都只是“话术”，这些话术当然有它们各自的含义和影响，之

前的问答都已经详细谈论过。但是这些话术掩盖了佳士运动内部的实际政治模糊性，具体来说就是，参与佳士运动的声援团青年成员们大多并没有清楚的政治主张、政治愿景，然而他们却都打着“马列毛主义”的大旗，在对外宣传的文章中都标示着对毛泽东的感情、对毛泽东时代的向往、对毛泽东思想的认同——所有这些标示和旗帜在没有实际内涵的情况下都成了空洞的符号。

但是这些标示和旗帜还不只是空洞的符号。因为“马列毛主义”“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思想”这些大词都有公认的含义，只是佳士运动大多青年参与者未必都那么了解清楚，如此一来，这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甚清楚、却被他们用以自述的大词就成了他们先入为主作茧自缚的思想束缚。他们用这些大词束缚了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吸纳其他毛派或者迎接公共政治讨论的思想容器，结果是从根本上限制了这些青年的思想，也限制了社会上更多人群与他们的接触交流（既因为社会主流对毛派持有巨大的不良刻板印象——青年毛派普遍低估了这一点，也因为人们确实不好向一个已经宣称了坚信特定政治立场的组织提出讨论，那在政治上会被视为不友好），也就束缚了这些青年的思想政治进步空间，但确实方便、亲近了其他毛派去接触他们。

但是，就毛派来说，由于中国毛派确实在思想上存在着老左派和反国家主义倾向的新一代左派的分野，而老左派里又存在着更亲近上层的派系（如乌有系）与相对更有斗争性的派系（如红色参考-红色中国

网系)的分别,而许多运动参与者的政治认识模糊混乱的情况下,最积极进取、最强势的那个政治集团就有可能在这种乱局中夺取运动领导权,这就是在 2018 年 8.6 政治集会前后所发生的情况——乌有系得到了当时青年毛派里最有野心的那些人的青睐,乌有系的政治思想成为当时佳士运动的主导,乌有系范景刚也确实想与青年毛派一起在深圳策划一些政治动作,只是后来事变太快使其未能如愿(详见前述第 15 问的回答第二段)。

我们可以浓缩出这样一条政治教训:一个既无政治原则、又在公开群众斗争中无共同行为底线的团体,即使牵强地宣称了特定政治立场也不能消除其实际政治上的模糊性、反而限制参与者的思想政治进步可能性,最致命的是这种无原则、无共同行为底线、无内涵的实际政治模糊性会为投机野心家争夺局面大开方便之门。

C.策略问题

<19>如何看待少数工人和学生积极分子到派出所聚集抗议、要求放人的行动策略?

佳士运动积极分子在 2018 年 12 月的争辩中辩称:“当佳士工人在厂门口斗争的时候,暴力机器燕子岭派出所登场,把佳士工人肆无忌惮地打了、抓了。这个时候斗争的场所自然是派出所了(当然这个过

程中，先进工人们也从未放弃过开展对佳士工人的工作，并提出工友诉求），主要诉求必然是要求放人与严惩打人黑警了。如果不同警方进行公开的斗争，如果不去痛打派出所，动摇其介入决心，就不可能有条件进行其他任何斗争，因为警方随时都可以肆无忌惮的干预。所以选择在派出所门口示威的办法，不但是斗争发展的自然和必然过程，而且是非常正确的战术。”（出自 2018.12.21 “先锋评论员”《“甩脱尾巴很重要”——佳士事件短评的短评》）

那么从事后的发展来看，佳士运动积极分子到派出所门口示威，是否有效动摇了警方介入佳士运动的决心？

佳士运动是否达到了“痛打派出所”的效果？（或者至少起码曾经达到过这种效果？）

佳士运动是否证明了，“痛打派出所”能够动摇警方介入佳士运动的决心？

佳士运动积极分子的这段辩解说明了什么问题？

佳士运动确实不是第一次由工人到派出所示威要求放人的斗争——此前几年里广东珠三角地区发生过多此这样的斗争事件。7 名佳士积极分子是在 2018 年 7 月 20 日上午被派出所带走后、紧接着有 19 名工友到派出所声援随后当天下午也被押上警车，到了 2018 年 7 月 21 日（星期六）白天已陆续全部释放，后来声援团上述辩解的效力就只到此为止了。但是之后在第二天 7 月 22 日全部 20 多名佳士运动积极分子再次聚集燕子岭派出所门口展开了新一轮抗议示威，目的已

不是要求放人(因为——再次强调:截止 2018 年 7 月 21 日下午 14:30 左右,所有积极分子均已释放),而是要求派出所严惩警察。

这 7 月 22 日开始的新一轮抗议示威的诉求,这样聚集在国家暴力机器派出所门口要求国家暴力机器“严惩”自己人的抗议示威行动,以及这个行动持续的时长(从 7 月 22 日星期日直到 7 月 27 日星期五再次被抓为止),都是近几十年来珠三角工人群体十分罕见的斗争。过去从未发生过工人在被释放之后仍然跑到派出所门口聚集、要求派出所严惩它自己的警察,因为工人和警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普遍事实摆在那里(严格来说只有普遍发生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大气候时例外,但我们应该承认在 1989 年之后暂时再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群众不会去挑战这个悬殊的力量对比;也从未出现过派出所在群众压力下被迫惩罚自己警察这样的事。所以这场斗争是在工人和警方的力量对比极其悬殊情况下发生的,与运动幕后组织决策者一开始就极大高估全国进步力量的实际支持、以为将能促发其所臆想的某种极大力量的政治运动等特殊考虑有关(这场 7 月 22 日下午开始的“派出所门口示威”发生时,运动还没有抛出 7.23 联名要求书、大规模的网络联名动员还没有开始、7.27 大抓捕也还没有发生、为声援 7.27 事件的一众老左派“奔赴深圳坪山”的号召也没有发生)。这样一个破天荒的史无前例的斗争事件显然根本不可能是什么“斗争发展的自然过程”,而是基于非常不利的实际力量对比和少数组织决策者极大的政治幻想精心策划出来的斗争。

然而无论在当初来看还是从事后的发展来看，佳士运动积极分子到派出所门口的示威都不但丝毫没有动摇警方介入的决心，反而更加加速、加大了警方介入镇压的进程。仅仅在这场“派出所抗议示威”仅仅进行到第6天时就发生了7.27大抓捕，而且一口气刑事拘留了全部29人，注意是刑事拘留，而不是一般的只为惩戒的短时间关押的治安拘留、行政拘留，这样大规模的刑拘在之前二十年中国所有的劳工维权事件都是从未有过的，乃至在所有打压社运活动者的事件里都是从未有过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证明“派出所抗议示威”产生了“痛打派出所”的效果，倒是可以看到佳士运动积极分子一面被痛打，一面嘴硬，直到一次次被捕后越来越软化，最后贺鹏超长篇供述劝降书领导佳士运动快速奔向全军覆没和极不光彩的集体认罪忏悔。

佳士运动积极分子为“派出所抗议示威”所做的那些辩解说明了他们把脱离实际的幻想作为支撑他们斗争的精神支柱，在他们的斗争到了最危险的最后关头也仍然不愿从梦中醒来，直到不久后真正被敌人痛打、打到头破血流跪地认罪。20世纪国际共运先驱罗莎·卢森堡曾经说过：“无产阶级的解放取决于它是否懂得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自我批评，无情的、严厉的、彻底的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运动赖以生存的空气和阳光。”我们可以把卢森堡所说的因素倒过来说：如果无产阶级不懂得从无情、严厉、彻底的（但毕竟仍是同志式的或相对内部的）自我批评中吸取教训、及时悬崖勒马，却一定要等到被外部

敌人的铁拳屈辱打趴、打到脸面统统荡然无存之后才被迫“反思”，那么这样的斗争就已经注定了是毫无前途的。

<20>在 **2018** 年 **7.27** 大抓捕后，被刑拘的 **29** 名工友和学生确实大多数人很快陆续取保候审，这是否说明佳士运动声援当时奏效了？是否说明佳士运动当时向派出所大胆施压的策略确实有些成功之处？之后的 **8.24** 清场，学生也只是被遣返回家乡，似乎损失不大？

2018 年 7 月 27 日，燕子岭派出所陆续抓捕了 30 人（另说 29 人，有据可查，此处取 30 人说），很快在 8 月 2 日就有 30 人中唯一一名学生取保候审，此后几天里陆续有兰志伟、唐向伟、余凯龙等 7 名工人取保候审，到 8 月 4 日晚上就已经传出消息说有十几位 7.27 被刑拘者已经取保候审（消息源：王江松推特 2018.8.4.22:04），截止 8 月 23 日即 8.24 清场前夕 30 人中有 25 人都得到了取保候审，只有 4 人一直被关押（余浚聪，米久平，刘鹏华，李展）。这确实算得上“大多数人很快陆续取保候审”，确实说明当时的佳士运动声援起到了较大效果。但是我们需要明辨是怎样的因素起到了效果，尤其因为当时佳士运动声援采取了多种方式（到派出所抗议、声援团在深圳的各种奔走呼吁、声援团派人到北京串联老左派进行呼吁、在 **7.23** 联名书名义下全国左派呼吁“速速赶赴深圳坪山燕子岭”、各地高校学生发起集体声援运动、外媒加大力度宣传报导）。

如果我们要深入讨论这个具体策略问题，就仍然需要认真还原当时的基本事件脉络。幸而有人整理了“佳士事件时间线”可以据以概括出2018年7月底至8月上旬的事件脉络（以下是极简的概括，详细情况请自行查询“时间线”全文）：

7月27日（五）下午及晚上燕子岭派出所针对佳士运动陆续抓捕了30人。

7月28日（六）上午，时代先锋等平台首先声援“西安20岁女大学生（胡开巧）昨天和工友一同被抓”，呼吁大家打电话质问。下午，时代先锋等平台发文以吴敬堂名义呼吁“奔赴深圳坪山！为了工人阶级的觉醒，为了毛主席”（吴敬堂是吉林通钢工运老工人代表），老战士古正华、乌有系范景刚、原中国工人网编辑张耀祖、毛旗帜网站长时迈语录一并贴出。

本在广州日弘厂被解雇维权中的沈梦雨赶到深圳坪山燕子岭派出所，在沈梦雨等7人被短暂扣留后，临时组成的沈梦雨等十几人声援团当晚在燕子岭派出所门口抗议示威。

声援团发公开信“致深圳坪山区委书记陶永欣”，要求立即处理7.20警察暴力执法和7.27大抓捕事件、立即放人、严惩打人凶手、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此文迅速成敏感词，所发到的众多微信群很快被封。

7月29日（日），沈梦雨带领声援团十几人在距离派出所200米左右的小广场喊口号、唱歌、举毛泽东画像。（从这天起，已经无法到派出所门口示威，只能聚集在这个小广场）

在当天时代先锋的文宣里，上述四大佬以“佳士工友声援团代表”名义称“携声援团1200余位同志号召广大热心人士支持佳士工人阶级的正义斗争!!!请速速赶赴深圳坪山燕子岭!”并贴出“年轻的工人代表沈梦雨”联系电话。截止当晚，7.23佳士积极分子联名信签名人数已超过1200人。

同日，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各自分别以“全国高校声援团本校分团”名义陆续发布声援佳士被捕工人的联名声援书。很快引发外媒高度关注。

当晚佳士科技的官方公众号发声明反驳“恶意诽谤”。

7月30日（一），沈梦雨带队的15人声援团前往坪山区政府递交公开信被拒，沿路返回时被警察带走扣押了四小时。当晚，香港有线电视报道了此事。郑州毛派工人维权活动者到深圳坪山与声援团会合。当天有活动人士、学者、律师等各界人士声援佳士运动提出要求放人、建工会等诉求：乌有系老左派张勤德发“紧急呼吁”；潘毅等15名华人知识分子发起“全球各地学者”名义致深圳市政府、市总工会的公开信，两天就过百名学者联署；“中国人权律师团”也发声明声援。又有西北政法大学、清华大学、宁夏大学三所高校分别发出学生联名声援书；北大学生联名发起人岳昕发文辩护、鼓励签名，截止当晚北

大声援书已有 **1600** 多人联名，大部分是受北大学生感召的社会各界人士。“德国之声”报导“北京高校左派学生高调声援深圳工人维权”。当晚，深圳坪山公安官方微博通报佳士 **7.27** 事件，深圳公安官方微博转发支持。

7月31日（二），坪山区总工会的官方微博称佳士运动积极分子米某平等未按工会法规定发起筹备活动。

声援团连发多篇文章：“致佳士科技合作厂商”揭佳士厂众多违法问题希望其合作厂商“重新审视与佳士科技的合作关系”、发公告招募律师、“十问深圳坪山区政法委书记李某中”发出激烈质问、起底揭露和抨击佳士科技及其总裁兼人大代表潘某、发声明反驳佳士科技微博。

当天又有北京、河南、黑龙江、宁夏 **6** 所高校学生分别联名声援，其中 **5** 所学校均以“全国高校声援团本校分团”名义声援。多家外媒关注“六四后首次”北大等多所高校声援工人维权，“自由亚洲电台”连发两篇报道关注佳士事件，其中之一是“大学生声援佳士工人自由工会各界瞩目”。

8月1日（三）清晨，律师范标文会见了被刑拘工人代表米久平的信息已出现在网上。

香港职工盟、社会民主连线、街工劳工组、劳动力等多个团体游行到中联办抗议，声援佳士运动。国际特赦组织发新闻稿声援佳士被捕工人。

声援团倡议募捐帮助被捕工友和学生捐助，呼吁被捕工友的家人与声援团联系、贴出联系方式；还发文批驳坪山公安 **7.30** 通报。

深圳坪山龙田街道总工会批复了佳士科技成立工会的请示。

又有广州、上海的高校学生和校友发起联名声援书。

一些左翼组织或劳工小团体纷纷发文章、报导声援（山西毛学组、国际左翼组织 **CWI**、亲王江松的工友文宣组）。

8月2日（四）：传出 **7.27** 被捕学生胡开巧已获释，并已回到家中的消息。律师在看守所会见了 **7.27** 被捕工人余浚聪、米久平。

广东省总、深圳市总、坪山区总、龙田街道工会四级官方工会进驻佳士科技组建工会。当晚佳士成立工会筹备小组。

声援团截止当天上午 **9** 点半（仅半天时间）已募集捐款 **55922** 元。

当晚工人下班时间，声援团在坪山周边工人聚居区宣传佳士工友建工会事迹。声援团当天接连发文：唱衰佳士科技股票、揭露抨击佳士科技是“人间地狱”。

甘肃兰州、湖南高校学生分别联名声援佳士工人。

国内外各团体各界人士进一步声援：台湾 **27** 个劳工团体及学生团体联署声援；香港《亚洲周刊》着重报导“北大清华等全国学界声援深圳工运争取组建工会”；“声援团在京代表” **7.30** 在退休高干老左张勤德组织下的支持佳士斗争座谈会纪要发布；乌有系范景抵达深圳坪山发声明支持佳士运动。

8月3日（五）：新生代发布“紧急快讯”“强烈谴责反人道罪行 立即释放哺乳期女工张泽瑛”；声援团发布 **8.1** 律师会见米久平、余浚

聪纪要；声援团当晚到佳士厂附近城中村向工人宣传佳士工人建工会被打压的事件。声援团发文抨击坪山区人力资源局将于**8月4日**举办“员工背景调查实务讲座”。

当晚王江松推特透露，**8月1日**范标文等律师会见了被捕工人，**8月2日**闻宇与黄沙两律师早上交会见手续，当天下午就被广州市律管处谈话，要求退出。

8月4日（六）：7.27 被捕工人余凯龙取保候审（据声援团转发的消息）。当晚王江松推特称，“据说有十几名佳士案被刑拘者已经取保候审，但仍受控制之中，不能与外界联系”。此前也有些工友群传说有六七八人放出，但不确定。声援团暂未发布更多相关信息。

声援团称全国参与联名声援的高校已达到**22**所，又有浙江、江西的高校加入声援；**6**名北大学生、湖南在深尘肺维权工人代表**4**人陆续赶到坪山与声援团会合。另有若干工人名义的声援和到场支持。声援团和“转达律师意见”的王江松推特就律师费问题发生公开争议。

据说原定由区人资局主办的员工背景调查讲座取消，声援团指主办方做贼心虚。

8月5日（日）：声援团通报，截至**5日0点**已收到捐款**113142**元。当天，声援团租住房屋附近有多人蹲点、房东强令要求登记声援团租住房屋所有人员信息否则报警。声援团发布了几名刚刚取保候审的**7.27**事件工人所揭露的遭遇警方迫害的遭遇。已参与声援团的北大学生写文解释为何参与。

曾带领几百名陕西下岗工人维权、被捕时得到过全国毛派声援的工会活动家赵东民致信全总主席，恳请全总介入佳士事件，化解矛盾，预防暴力维权事件。

8月6日（一）：当天下午声援团在龙岗看守所确认：7.27事件30人已有16人取保候审（分别是15名工人和1名学生），但仍然受警察监视和骚扰；仍有14名工友没有释放，其中包括哺乳期女工张泽璘。

至此，7.27被捕工人30人中已有16人、即已经超过一半以取保候审的形式暂时释放（在短短十天之内，对于一个大规模刑拘事件来说确实算得上很快放人了）；从8.6政治集会之后直到8月23日，又有9人取保候审，至此30人中25人释放。

那么从上述历史事实的列举来看，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当局很快放人了呢？难道是声援团号召到派出所门口示威抗议、加大了对国家暴力机器的施压力度这一策略奏效了吗？

首先从2018年7.27大抓捕之后短短十天迅速发生的一系列事变来看，聚集在深圳坪山的区区十多个声援者（关于这个人数，即使是8.6政治集会的“约50人”，除了刚刚赶到、并没有呆太久的“张勤德一行四十余人”，长期驻扎的沈梦雨岳昕等声援者也就十几人）显然不是最突出的影响因素，更突出得多的因素是这些声援者每一步行动都

会通过影响全国数千人尤其在深圳工人里也有一定影响的网络自媒体平台迅速通报出来扩大影响、又在影响层面更广大的香港及国外媒体上密集报道出来，而 7 月 29 日中国人大、北大、南京大学率先发起的、短短一周多就据称有 22 所高校参与的全国高校学生联名声援佳士工人维权的运动更是轰动了社会各界和国内外舆论，正如媒体所说这是此前近三十年的、自 1989 年以来前所未有的事件。而且从半天就募捐 5 万多元、4 天就募捐 11 万多元可以看出，2018 年 8 月初群众支持佳士运动的势头曾经是很高的（也可以证明潘毅等人后来批评群众不支持佳士运动是一种事情过去很久以后的无端指责）。正是这些前所未有的学生运动和异常突出的政治敏感性、自媒体舆论及带动的社会公众关注、外媒高度关注的因素，才使得深圳有关当局感受到了巨大舆论压力，试图通过很快放人以息事宁人。

至于是不是毛派通过体制内的工作或者声援团及其他声援者向深圳各级政府的呼吁也发挥了一定影响，这难以搞得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到派出所示威抗议”对于深圳有关当局并没有多大压力，实际上 7.29 开始声援团再也无法靠近燕子岭派出所展开活动，只能在距离派出所 200 米远的公共小广场上活动，并且在所有活动里都受到便衣警察的跟踪监视；而且在 7.29 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最初 7 月 22 日星期天在燕子岭派出所门口示威那样引起数百路人同情围观的情景，任何长时间的街头聚集都变得越来越困难，能够获得线下群众的有效支持也越来越少。从种种迹象来看，负责压制和管控佳士运动

事态发展的根本不可能是小小的燕子岭派出所，也不可能是坪山区公安分局或者区政府，而至少是深圳市政府级别的人在负责、广东省政府不晚于 8 月 2 日也已介入，否则不会有广东省总工会、深圳市总工会于 8 月 2 日也一同入驻佳士科技组建工会，也不会有 8 月 2 日下午广州市律管处约谈要求相关律师退出佳士案。所以事实情况是最迟到 **2018 年 8 月 2 日**，已经形成了至少广东省一级当局有关负责人员与一场近三十年来全国前所未有的高校大学生-工人维权联动运动对立的架势，最突出的影响是事件本身特别严重的政治敏感性——全国各地大量高校学生近三十年来前所未有的有组织参与、全国左派舆论声援及群众关注热潮、海外媒体广泛报道，这些才可能是促使有关当局尽快放人以求平息事态的主要原因，而不可能是早已有名无实的“到燕子岭派出所示威抗议”。

“到派出所示威抗议”不但不是促使有关当局尽快放人的主要原因，反而对声援被捕工人起到了有害作用，即使这一策略已经有名无实，也仍然如此。因为这种明显用力过猛的鼓吹噱头进一步强化了声援运动的对抗性、激发声援团高调做出了一些挑战性很突出的街头政治示威活动、更加升高了有关当局的敏感戒备的敌意——即使他们确实在具有严重政治性的舆论压力下很快放人，但随后显然加大了骚扰的力度，试图加紧息事宁人（强力骚扰的做法并没有改变当时有关当局“息事宁人”的策略方向，至少直到 **8.24** 有关当局仍抱着类似“治病救人”“平息事态”的态度，事后再回看这一点是更清楚了）。我

们需要正视在“很快放人的十来天”（7.27—8.5）之后也就是 8.6 至 8.24 清场前夕，在又有 9 名 7.27 被捕工人释放的同时，深圳资深的劳工 NGO “打工者中心” 两名劳工维权人士被刑拘带走、声援团头号代表沈梦雨 8.11 被绑走并一直被软禁在家、声援团负责同家属和律师沟通代表小胡一度被绑走软禁（8.12 被绑、8.21 逃出控制返回声援团）、北大学生运动代表人物岳昕一度险些也被绑走、声援团 8 月中旬线下集会和租住地一再不断被骚扰或频繁地被警方裹挟家长来抢人等众多情况表明：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到派出所示威抗议”以及其他激烈进攻性的政治示威行动的策略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没有起到声援团事后百般辩解的“动摇派出所介入决心”的作用，反而使得警方在确实很快暂时放人的同时紧接着加大了介入打击的力度，而且是多管齐下（派人蹲点、跟踪、派奸细打入声援团、动员家长一起绑架学生积极分子、屏蔽集会附近手机信号、向租住地房东施压、冲击声援团集会等）。如此高密度、敌对性强烈的全方位骚扰打压，就是在此前二十多年的劳工抗议事件中都是罕见的。

至于 8.24 清场，学生确实只是被遣返回家乡，并不是因为佳士运动显示出巨大威力吓破了天朝统治阶级的胆（声援团文宣充斥着大量这类夸张的宣传），而是这些学生来自众多知名高校、一些高校的负责干部和众多学生家长都在 8.24 清场时来到了深圳坪山（比如据声援团成员、人大学生严梓豪后来公开发布的自白书，中国人民大学的校

长都到了现场），深圳有关当局在实施清场时显然顾及了这些高校的面子，也有让学生家长、亲属及学生原籍地警察等人去“做”学生的“工作”、把声援团学生控制回原籍地的考虑。（据声援团成员、人大学生陈可欣后来写的自白书：「从**8月24**日下午，我的父母、我的舅父母、我的爷爷奶奶，原籍市、县两级公安局的警察，甚至从大学、高中倒回到初中的三个班主任……都陆续来到了惠州，排着队配合警察与我“交流”。真是受宠若惊，折腾了**40**多个小时，最后陪我“回家”的，加上司机，一共**21**个人！更有甚者，我家乡的初高中同学好友均被打过招呼，不得借身份证给我使用。」）

由此可见，声援团学生在**8.24**清场中“只是”被遣返回老家也并非更轻松，所受到的控制和精神压迫也不小（熟悉天朝政治迫害的人知道：所有“犯过事”的人至今仍会受到密切监视、不定期“问候”、每逢所谓敏感时期必定深入“问候”）。而且**8.24**清场涉及不只是深圳，还有北京，除了**40~50**名人大北大南大等高校学生被遣返回原籍地老家，还有在北京的《红色参考》编辑尚恺、北科大毕业生杨少强、在深圳的声援团成员工人吴海宇、从南昌大学毕业后到广州艾帕克汽配厂“融工”并在佳士运动中负责联络被捕工友家属的胡平平共**4**人被刑拘，还有**5**名在声援团的核心骨干分子被监视居住——沈梦雨、顾佳悦、岳昕、郑永明、徐忠良。这一共**9**人在此后的运动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后来据说大多已经释放，被严厉警告封口，但具体情况不明）。

如果更公道地把 **7.20** 到 **9.24** 这两个月的打压情况都算在内，那么就是：除了 **40~50** 名人大北大南大等高校学生被遣返回原籍地老家，有 **3** 人被刑拘（尚恺、胡平平、杨少强），**5** 人被逮捕（余俊聪、刘鹏华、李展、米久平、付常国），**5** 人被监视居住（沈梦雨、顾佳悦、岳昕、郑永明、徐忠良），这总共 **13** 人都是社会运动骨干（当然还是要公道地补充说明，劳工 **NGO** 工作者付常国本来与佳士运动没什么实际关系，是被连累迫害的）；另外一共还有 **27** 名工人和学生处于戴罪在身的取保候审状态，这 **27** 人与其他 **40~50** 名被遣返的高校学生都处于被严密监视控制下，还有数量更多的相关联人员、网站被调查和被加强监视。

这样的损失还不大？付出这样惨重损失的运动，其活动分子为什么反倒还极力辩解说他们的策略是成功的、是成功“痛打了派出所”“动摇了派出所介入的决心”？——思考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即本文第 **19** 问）还更有实际意义。

<21>2018 年 **7** 月到 **11** 月佳士运动一再出现“抓了又放、放了又抓”的情况，一度有声援者认为“现在并不是中央统一定性”，敌人只是跨省抓人的广东警方和大搞约谈、定性的北大党委，并认为“当局不敢定性”以及一再有人被抓后又放出都是声援团坚决斗争的成果；

再之后半年里，有声援者又认为强力部门一再放出即将审判的消息、结果却没有公审，也说明了声援团的斗争是有成效的。那么这些情况为何发生？是否真的能说明声援团的斗争迫使了当局“不敢”定性、“不敢”公审、抓了又放？

佳士运动的定性问题、公审问题、处理问题是三个不同的问题。

首先是定性问题。当局在 2018 年 7 月到 11 月之间确实没有“统一性”包括佳士工人抗争和各地高校学生声援在内的整个运动，而是依照已有镇压惯例，先是刑事拘留了最先抗争的二十多名工人（7 月 27 日）随后又以取保候审的形式释放了大多工人（2015 年对女权人士和劳工 NGO 人士已有类似镇压手法），在第二轮镇压时也只是把大多数高校学生遣返回原籍地（8 月 24 日）。2018 年 11 月 14 日“电报”传出截图：当天北大党支部全体会议宣称：“一个存在不少于四年、有严密组织、纲领（核心纲领是均分所有财富）和加入条件以颠覆政权为目的的非法政党组织被一网打尽了，该组织深入渗透马会，尤其是马会高层”（有据可查）。

从全部流传出来的消息来看，除了北大党委，没有其他党政机构做出上述同类的判断。但我们所有人都难免存在一个盲点：统治集团完全可能按住不发那些如果发布出来会对维稳产生重要负面影响的消息。这在当代党国官僚统治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比如文革造反派运动里的

一些显然极度危险的政治对抗活动，官方视之为“反革命”，除非公开“平反”过、从来不会公布，只有通过当事人几十年后发布的信息才得以公布（比如《左拾遗：红卫兵运动中一个被遗忘的人和事——予红与广东第一个马列主义小组》；又如 1989 年朝鲜首都平壤出现过反体制的左翼政治组织，是后来逃亡者才公布出来的）。

然后是公审问题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即如果公开审判将对维稳造成重要负面影响，那么就不会公开审判，只有当事人坐牢出狱后或者由其接近者主动告知外媒才可能披露出来，这方面例子在当代左翼政治圈里就更多了。比如：2013 年 11 月由薄熙来支持者、高校教师王铮发起的“中国至宪党”被取缔之后，王铮本人先是被秘密拘捕，后被秘密审判（来源）；更大的案件比如 2009 年 10 月在重庆被取缔的“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34 名代表被捕（据该词条的维基百科），据“左派人士陈先生”向外媒告知，全部都是秘密审判，而且党首马厚芝在 2019 年 10 月刑满出狱时都被官方严密封锁消息（来源）；除了毛派，还有其他左翼政治组织，例如托派 CWI（“工人国际委员会”）早在进入中国大陆最初几年（不晚于 2007 年）就被高层锁定并严密盘查，其参与者被秘密胁迫、威逼恐吓，官方至今从未说过如何定性、审判、处置，只有当事人自己抖露出来（来源）。

至于强力部门私下对相关人员发出的“即将审判”消息，未必就等于说“要公开审判”。秘密审判当然也是审判。

所以，对于官方认为极度危险的类似于涉及组党、政治结社的团体案例（无论团体规模大小），基本都不可能公开审判，也不会公布如何定性。所以，包括核心骨干分子的认罪视频都不会大范围公开，也就不难理解了。从一般意义来说，可以说官方“不敢公审”所有涉及组党的政治案例，因为官方担忧这些案例被公众知道后引发对现政权的惊讶和怀疑（从专制统治者角度看，不如让被统治者不知道任何政治反对派的存在，才更安全）。但是如果特别地要说是佳士运动的斗争卓有成效，才使得官方“不敢”公审，则完完全全是佳士运动支持者第 N 次打肿脸充胖子的自我意淫了。

至于如何处理，又是另一个问题。在当局处理佳士运动的过程中，很显然有大量参与者只是一时妥协——向当局承诺不再参与各种抗争活动，所以才得到了取保候审或者一时的释放，当他们得到自由、重新与队友联系上之后很多人又重返抗争，被抓后又再妥协，这样才形成了“抓了又放、放了又抓”的情况。

而在最终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上，官方显然延续了过去几十年来的传统：较为优待高校学生，也对妥协认罪者做了较宽大的处理（而由于大量没收手机和电脑，并且行踪受到比之前更多的监视，他们再想发声都难了），同时一些相关联的工人骨干、劳工工作者却遭到沉重打击、

其中一些人至今没有释放，还有一些显然被牵连的劳工 NGO 维权人士也至今没有释放，他们可能已经或即将遭到秘密审判。

客观来说，佳士运动在前期（2018 年 7-11 月）确实一度争取过一些舆论上的主动，但从最终实际处理的结局来看，佳士运动不仅最终失败而且完全处于被动中，完全没有“迫使当局不敢”如何如何，反而是当局处理起来游刃有余，——天朝最高领导人 2019 年五四青年节前夕甚至公开说了这样一番得意洋洋的话应当让佳士运动支持者和同情者倍感耻辱：「我们要悉心教育青年、引导青年，做青年群众的引路人。青年要顺利成长成才，就像幼苗需要精心培育，该培土时就要培土，该浇水时就要浇水，该施肥时就要施肥，该打药时就要打药，该整枝时就要整枝。」

如果运动支持者不知耻辱，反而继续踩着运动失败后的废墟自吹自夸自我意淫，那就是耻辱中的耻辱，可悲至极。

<22>佳士运动“组建工会”失败，且未能反制官方后来成立的工会，这是否能证明一度与声援团合作的红中网对“工会路线”的批判？或者反而证明了 **CWI** 所指出的：改组工会已经走不通，中国工人应当争取“独立工会”？但与此同时，佳士主导者始终与“独立工会”划清界限。

作为工人发动斗争的方式，争取组建或改组工会的作用/目的/关键是什么？

红中网 2019.1.1 的文章称：据“最近以‘青年先锋’名义发表的一篇总结文章”，佳士运动积极分子“从一开始在主观上就幻想可以成立正规的、公开的、受资产阶级法律保护的工会”，“进而争取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建立工会则靠左翼青年进厂和向工人积极分子灌输，发动工人斗争。（参见 2019.1.1《红色中国网工作组致青年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的建议书》）。

不过笔者查询到 2019.1.1 之前“青年先锋”只有一篇《佳士运动的争论与反思》发表于 2018.11.16，这篇文章却并没有红中网所描述的那样看法，它只是说道：

「从运动的视角来看，即使有理念之争，左翼当前的运动议程应该是一致的，从总体上支持工人组建工会，……从经济形势发展、工人阶级发展的客观趋势来看，工人们提出超越经济诉求的制度性诉求——即组建工会——是必然的。……佳士事件中工人们更为强调的是反对“佳士十八禁”这种不合理的工厂制度……而要反对这种管理制度，相对长期有效的途径就是组建工会来表达诉求。……如今的中美贸易战就是这种争夺的一次体现，这种争夺可能难以一次决出胜负，但无论如何长期来看始终会分出强弱。强势一方的社会矛盾将有一部分被

转移到弱势的国家，但其本国的经济斗争、组建工会的斗争也可以由此具有更大的空间——争取工会并不等同于改良主义，这反而有助于在危机时避免群众听信繁荣时有用的改良主义。至于竞争失败的国家，阶级矛盾将会被激化，政治性的工人斗争将更容易被动员起来，组建工会无疑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步。……最后，随着外围国家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被纳入雇佣劳动者之中，原本的廉价劳动力会逐渐提升其价格，原先因为劳动力需求不足而彼此激烈竞争的工人转而要求工会的可能性也会逐步提升。总而言之，像佳士工人这样要求组建工会的行动，是各种可能趋势所组成的大势之所趋，即使不是在今年提出来，也是迟早、早晚要提出来的。……工人要组建工会，就要努力跨过——国家机器（包括上级工会）的妨碍——这道坎。……」

从以上摘录了的该文中几乎所有提及争取组建工会的部分，都没有看出“青年先锋”（即主导佳士运动的青年积极分子）幻想以为可以建立起正规、公开、受法律保护工会，他们只是把“组建工会”作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和运动策略，而这一点正如“青年先锋”所说是“左翼当前的运动议程应该是一致的”。

但更重要的事实是：佳士运动虽高举组建工会的旗子，运动的重心却早已不在争取更多工人组建工会的努力，而是实际上早在**2018年7月底**就开始转变成了一场大力动员学生和各界群众的声援运动（严格来说已经不是工运，而是从工运延伸出去的、只是声援对象涉及工运

的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因此有关工会策略的争论，对于佳士运动来说，实际意义很少，象征意义更多。

从实际意义来说，佳士运动是“在官方工会的框架下争取改组工会的努力”的一个失败案例，但这个案例却远不足以讨论“改组工会”的策略是否已经彻底行不通了，因为这个案例远没有充分实践“改组工会”——它只是在筹备阶段就被资政双方果断地打断了，因为它的群众基础不足，而积极分子的行为相对于群众又过于激进、早早就被资方锁定进行打击报复（在 2018 年 7 月 12 日坪山区总工会否决佳士工人建工会后几天，刘鹏华、米久平等建会积极分子就被开除了，更早在 5 月 11 日余浚聪就被开除了），所以没能做真正意义上的“改组工会”实践。

显然，现在已经几年没有再出现过工人积极分子策动“改组工会”的努力了，这与官方工会的保守现状有关。（最近几年官方工会仍叫嚷着改革，但在实际工作中只是把自己变为一个权益咨询或宣传类的服务机构，只是做着改进网站和公众号之类工作，部分工会引导要维权的工人走仲裁程序，雇佣律师做法律援助，或招募一些更能安抚和忽悠工人的职业工作者等等。顺便说一句，即使官方工会的这些改革努力，也只是因为 2015 年 7 月最高领导人在“群团工作会议”上的严厉批评，让工会高官感受到想要不丢官就必须得做出某种改变，但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难以导向有利于工人维权的实质改变。）不过，没

有证据表明，官方工会的保守现状将永远定型、永远不可能再有变化了。

在 **2016-2017** 年出现过两个少有的但值得注意的例子。一是 2016 年 11 月位于广州的日资企业索尼电子华南公司由于与收购它的中资企业深圳欧菲光进行谈判前后，没有与工人、也没有与工会沟通，该公司的工会委员会代表工人向资方提出了诉求，要求公布转让信息和让工人自由选择是否与新公司签订协议等，在资方没有回应工会的情况下，工人发动了大罢工，而后当地区一级官方工会介入协调，劳资双方坐下来谈判。（这件事至今仍在网上可以搜索到部分信息，例如腾讯网《[广州工人为不让日本人卖工厂给中国人罢工闹事？！](#)》）

二是从 2016 年 11 月到 2017 年 2 月的吉林长春一汽大众劳务派遣工的集体维权，一千多派遣工人的代表竟争取到了官方的全国总工会的支持，当然官方工会还是照例引导工人走向劳动仲裁，有中央级的全国总工会指示，吉林省工会、长春市工会、乃至省人社厅、省级劳动仲裁部门都不敢怠慢，专门为派遣工申请劳动仲裁开了协商会；而且相关派遣企业显然也受到了压力，给原先并没有加入工会的劳务派遣工发放了工会会员卡。虽然这些工会会员卡是做样子的、是在掩饰打压工人的行为、也因此被工人所怒斥，虽然那次劳动仲裁在资方及当地仲裁部门阳奉阴违的大力阻挠下没有成行（数百工人被阻止申请、工人欲起诉仲裁委也受阻），但这些事仍说明官方工会那时仍有介入

协助工人集体维权、并吸纳工人加入工会的意愿和行动。（关于这个维权案有一个只截至 2017 年 7 月的资料集）

仅仅这两个例子当然远不能说明官方工会还能支持工人集体维权，但是至少说明了这一条路没有完全堵死，在今后适当情况下——例如再次出现大量工人的维权行动意愿和紧张的劳资矛盾、而且也是发生在外资企业、看样子是工人自发的行动，那么统治集团的官方工会仍有可能介入支持，同时把工人吸纳到工会名义下。

（这里提出了使得官方工会比较可能介入支持的三个因素，恰巧佳士运动全都例外：并没有大量工人有维权行动意愿、恰恰不是发生在外资企业而是发生在一个当地政商界引以为豪的所谓本土民族企业里、资方也早早发现认定是几个“同一时期入厂的、总是故意制造事端”的员工在“搞事情”。这更说明了佳士案例远不是一个适合讨论“改组工会”策略是否仍有可行性的案例。）

所以，“在官方工会框架下发起改组工会”今后仍然是有可能的。当然，这种可能性在佳士运动之前已经越来越低，上述两个发生于 2016-2017 年的例子本身就是很少见的例子，佳士运动引起统治集团极大警惕后，统治集团无疑会更加谨慎对待今后工人改组工会的事件（如果还出现的话）。即便如此，仍然不能因为**目前形势**下官方容许这种策略的可能性很低，就**断言**今后官方永远不允许这种策略——无论在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说不通。

所以，红色中国网反对争取工会（包括佳士工人在官方框架下争取组建工会）的斗争，是完全说不通的。他们自己也知道说不通，所以编造了对方“幻想”可以建立“资产阶级法律保护的工会”、“进而争取建立资产阶级民主”这种所有左翼都当然会反对的政治观点，然后对之批判，——红中网这样做显然不是在认真讨论问题，而是另有目的。其目的就是要让对佳士运动失望的青年们转而放弃对工人斗争的信念，转而去相信可以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发展红色根据地、为在遥遥无期的将来支持薄熙来或薄熙来式的中共上层毛派色彩人物东山再起（即他们 2009 年以来一直在毛派圈子里贩卖的机会主义的“三线战略”）做准备（关于这个策略的详情，参见很可能由张耀祖所写、张耀祖和李明骐共同享有的署名“程广胜” 2009 年 4 月 3 日所发的长文《当前形势与社会主义革命》）。但这个目的对于现阶段的政治实践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与劝说人们放弃斗争、不要再相信支持工人斗争能有什么出路差不多。可是，现在还能否进行工人斗争是一回事，是否相信支持工人斗争是有积极意义的是另一回事。由于严峻的政治现实和自身限制，一些人暂时不能从事斗争活动了，这是无可厚非的，可是由于一次远不能说明问题的斗争失败就鼓吹放弃对工人斗争的政治信心那就是在宣扬投降路线了。2019.1.1 红中网工作组对青年毛派的建议书就是在针对工人斗争宣扬投降路线，还不只是宣扬争取工会的投降路线，是整个的左翼支持工人日常反剥削斗争的努力他们都予以彻底否定了。

至于激进反对派组织 **CWI** 认为改组工会已经行不通，中国工人应当争取“独立工会”，这在至少最近六年和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都是行不通的——关键在于斗争的大气候和实际力量对比，至少从 **2013** 年以来，这个国家的极权专制程度就越来越高，这种趋势和目前保守秩序目前暂时看不到大规模动摇的迹象。如果 **CWI** 坚持一如既往地只从左翼的“政治正确”出发，那是无法讨论这个斗争实践策略问题的，因为现实条件不允许，如果非要不顾客观实际条件、固执地只从“政治正确”出发，那么失败的可能很大，而且付出巨大代价却还不会有多少所得，包括甚至连同情群众都不会有多少，**2018-2019** 佳士运动的惨烈教训就是明证。

毛派红中网和自诩托派的反对派组织 **CWI** 关于工会斗争策略的争论，看起来好像是很有现实斗争意义的高大上争论，其实各怀鬼胎：**CWI** 只是想借题发挥兜售其看似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策略和“政治正确”，管它实际斗争有没有胜算反正拉一些激进青年入伙能拉一个是一个，红中网更是要趁机把佳士运动中失望不甘的左翼青年拉拢到他们的“三线战略”贼船上。工人斗争的成或败，佳士运动的具体策略探讨，都只是他们热衷的政治私货的注脚而已。

真正想要解决斗争策略问题的行动者需要这样提问：作为工人发动斗争的方式，所谓“改组工会”或“独立工会”这些策略的实质作用、目的、和关键究竟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一切斗争都需要为动员工人的组织、尤其首先是工人积极分子的组织寻找一种最合适的形式，无论是采取“改组工会”策略还是打出“独立工会”，这些策略说法都只是组织的形式、外衣、或者加强其“合法性”的方式方法而已，在提出这些名称、说法之前，行动者就得先实际发展出一个核心团队——或先期潜入工厂，或在工友中物色，至于这个团队叫什么名字那是后面进行公开斗争的环节时再打出的旗号。当然，这个实际核心团队可能在公开斗争的过程中进一步扩充，但前提是得在目标群众中有足够的核心积极分子，而且不能像佳士运动那样采取远远超过身边群众的过于激烈的斗争方式——那只会大大加快资方警觉的上升、导致积极分子过早就全部被踢出局。

无论是“改组工会”还是“独立工会”，在发起工会时都有一个工会筹备小组的阶段，那就是核心积极分子公开努力的第一个好时机，但更关键的时机是需要等到出现一个厂内工友普遍关注且有意有所行动进行抵制的焦点问题（在佳士运动中，“十八禁”罚款问题是否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焦点？从事后的 2018 年 4-7 月佳士厂内斗争的情况来看还远未达到很多工人愿意为此做出反对行动的程度，当然需要积

极分子在事前就有一个恰当的判断），然后在之后的每一步的维权活动和工会改选/选举活动里，都是实际的工人核心（借助工会筹备小组的形式）在一步步进行争取团结工友的努力，而不是单纯要依照法律去走那些工会程序，也不是单单只为一再表现激烈斗争的样子拿来宣传而已（反观佳士运动，一再反复表现激烈斗争的样子，甚至全部被解雇的工人积极分子排队冲进工厂里高呼胜利、摆拍视频、着重发上网宣传，那些积极分子却不知道这种表现更让一些普通工友群众质疑和排斥。均有据可查）。

所以，“是改组工会还是争取独立工会”只是一个策略问题，用更粗糙直白、但理不糙的话来说，这只是为实际工人核心包装怎样的说法、以便能更好地为运动赢得支持基础的问题。如果官方工会仍绝对垄断着工会名义和实际组织、社会上缺乏独立工会的群众支持，再加上官方工会也确实有积极改革或介入工人集体维权的意愿，那就搞“改组工会”；如果社会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松动、官方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独立工会”有了较大的群众呼声支持，那就搞“独立工会”。对于实际的行动者来说，这个策略问题是很重要（其实质是哪种包装更有利于争取团结群众），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包装了说法展开公开斗争之前，就要有扎根在目标群众中、并且得到群众拥护和有力维护的实际工人核心小组。如果实际核心都没扎根好、保护好，怎么包装也没用。

至于那些打着斗争工作策略讨论幌子长篇大论、夹杂着政治大词云山雾罩的辩论，对实际群众斗争都是没有什么用的（反而要警惕其中夹杂了什么有害的东西）。行动者切记：抓住实质，从实际条件考虑组织策略，关键在目标群众中发展核心力量、研究如何更好争取团结群众。这种策略问题没那么复杂。

<23>从 2017 年底的“八青事件”到 2018-19 年佳士运动，左翼积极分子在强力机关里的妥协、认罪一再得到理解和原谅（参见张耀祖 2018.1.20 文章《我们可以妥协，但我们绝不屈从！——声援广州八青年》，以及佳士工人声援团的众多文宣），甚至 2019 年初声援团贴出认罪视频文字版以后，声援团仍一概反驳。

问题：在强力机关面前的一切妥协认罪无论如何（比如出卖、导致其他人被捕或加重刑罚、劝说其他被捕者妥协）都是可以理解、原谅的吗？公开认罪的人出来后还能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吗？

在前面第 13 问关于“青鹰社主要负责人贺鹏超的全面招供之后大量活动骨干很快被捕、佳士运动迅速走向终结”的回答里，我们已经从基本立场角度批评过上述一味谅解妥协认罪的态度。显然，不是所有妥协认罪都可以理解、原谅，但究竟怎样的妥协认罪可以理解原谅，怎样的又不可以呢？这确实是一个应该结合时代社会特点、有一定灵活考虑空间的问题。首先，从社会公众角度来说，2013-2014 年以来

国家对异议分子的镇压采取了“上电视公开认罪”的处理方法，逐渐越来越遭到舆论的批评和不信任，反而越来越同情被迫在官方电视镜头前认罪的异议人士；而且在遭到专制当局的威逼胁迫、但在出来后又站出来抗争，这种情况也早已有之，而且通常都会得到公众的同情理解，所以，个人的妥协认罪在这个专制统治下应该可以理解、原谅。

不可原谅的事情在于，不仅自己认罪，还指认他人做了与自己同样的行为、招供出其他人，导致他们被捕或被加重处罚。在这样事情中，指认和招供本身是一回事，被指认和被招供的其他人是否谅解这种行为是另一回事。不能因为其他被指认和被招供的人中确实有人谅解了这种行为，就觉得指认和招供不是事、没有责任了。这样指认和招供他人的人，今后至少不应该再承担需要保密的责任。

更不可原谅的是，不仅认罪、出卖他人，还大力劝说其他被捕者一样妥协投降。这种人是彻底的叛徒，起到了比任何敌人都更厉害的从堡垒内部瓦解攻破的反动作用。这样的人不但永远不可再染指政治活动，一旦他露头（万一他将来又改头换面踊跃投机政治活动），还需要处处予以揭露、警告进步分子不要与之伍。今后纪念佳士运动，不可遗忘贺鹏超之流这个导致运动完败的最大之一教训——要把贺鹏超之流牢牢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同样也要铭记那些极力为贺鹏超之流辩护的毛派候补政客，为了将来的历史不再盲目愚蠢地重蹈覆辙，这是极为必要的。

<24>面对警方动员声援学生的父母到场施压的做法，声援团既争取了部分学生家人的支持，也发动了对部分成员家人的无情决绝斗争，例如公开揭发沈梦雨家长在其岗位上滥用职权的丑闻，号召公众关注、谴责，这种做法是否妥当？为什么？

在 2018 年 8 月，警方特意编造了一些谎言拉拢学生父母到坪山：说这些学生是被传销团体洗脑骗走了，警方很快就要抓这些传销分子了，但本着宽大为怀拯救学生的态度，就网开一面先让学生的家长劝说学生回家，剩下时间不多了，让学生家长们赶紧把自己孩子接走。当然，在普遍保守主义、普遍官强民弱又普遍缺乏平等尊重意识、社会民主意识的情况下，即使不用这些谎言，在警方介入的强大压力下，相当多普通群众（多数大学生的家长也属于普通群众）即使知道自己孩子是为了声援工人维权的，也倾向让自己孩子脱离那些有组织的声援活动，但也不排除有部分家长会支持自己孩子的正义行动。而普遍人身依附式的东方家长制习气导致很多家长在家庭关系中有过大的权威，他们很多人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儿女已经是年满 18 周岁、在法律上已经必须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和享有独立的公民权利的成年人，加上长期以来普遍官强民弱、警察滥权滥暴的社会环境，就出现了在 2018 年 8 月佳士运动声援者与一些家长在街头公开拉扯哭闹、有些

家长甚至到声援团驻地砸门要人的悲哀场景。在这种情况下，声援团采取了一些反制的斗争，从原则上说应该得到理解支持。

而且声援团确实成功争取到一些学生家长的支持（有录制视频发上网的），这种努力很有积极意义，值得肯定。而对另一些学生家长的拉扯、砸门等行为，声援团公开警告这些行为涉嫌违法、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将遭人民谴责和唾弃，这些警告说法也还算合理的防卫反击。

但是，声援团也有一些明显过激的不当做法，例如一味号召声援团成员与家人决裂和无情斗争，尤其是公开揭发沈梦雨家长在其岗位上滥用职权的丑闻、号召公众关注和谴责（显然试图想呼唤正在投身米兔运动的女权主义者及其盟友们）。声援团这些做法的最大问题是，他们是在用一种决裂无情的对敌斗争，对待家长的“好心办坏事”。笔者这里说这些家长是“好心办坏事”可能很多当事人不同意，因为据说包括沈梦雨在内的一些青年是支持揭发斗争自己家长的。但是这些家长阻挠自己孩子参与社会运动并因此遭致社会运动者的反对是一回事（这样的反对也是正当合理的），这些家长之所以阻挠自己孩子参与社会运动的用心、初衷却是另一回事——他们之所以阻挠，当然有保卫自己职位的意图（警方三天两头去他们单位找事、完全可以让他们丢饭碗），但也肯定有保护自己孩子的好心，否则，连阻挠都懒得阻挠。

在声援团 2018 年 9 月 2 日发出的文章《夢雨被父母软禁在家，其父沈国强曝出斑斑劣迹》中，即使是在不恰当地用决裂无情态度对待家长，但字里行间也透露出沈父至少有过好心：

「其父沈国强一直要私约夢雨吃饭，声称有个“叔叔”要见她，语气霸道强硬，不容置喙，和之前**包容、鼓励夢雨的态度**完全相反。」（里面粗体是笔者所加）

声援团大概是为了对比强调沈父强行带走梦雨时的霸道强硬，才说了“之前包容、鼓励梦雨的态度”，但如果沈父对自己女儿没安好心，之前又怎么会“包容、鼓励”呢，而一个曾经“包容、鼓励”自己女儿的父亲在遭到国家暴力机器强大施压后转而对女儿“霸道强硬，不容置喙”，也不是没法理解的吧。（笔者之所以敢肯定沈父也遭到了国家暴力机器强大施压，是因为沈梦雨很明显一直被警方当做佳士运动的重要人物，这篇文章也提到「软禁期间，国保与警察多次恐吓威胁夢雨，称夢雨为“1号头目”」）

当然，笔者说沈父（以及大多数学生家长）的阻挠行为是出于好心、关心，不等于说他们的阻挠都是值得理解支持的，更不等于说他们为了阻挠用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但家长行为的好心初衷，就使得声援者不能采取决裂无情的斗争方法，哪怕某个家长例如沈父本身确实有某些腐败行为——不能把两件不同性质的事情搅在一起。否则，这两

件不同性质的事情都不会达到应有的目的——米兔运动的本来目的是要促进公众参与来建立防治性骚扰的监督机制，佳士声援者与家长做斗争的本来目的是要尽可能减少和制止家长对运动参与者的阻挠，——这两件事如果真的搅在一起，米兔很难说会导向沈父所在学校防治性骚扰的方向，沈父就算因此丢了饭碗也不等于就自动丧失对自己女儿的关注（继续阻挠）。

而且就社会效果来说，一般公众很容易会觉得这是有些人故意找黑材料整人来达到某种吓阻目的；而对于其他需要处理家长反对意见的左翼学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榜样，让他们以为用直接伤害自己家长的做法来减少其干预是可行的，甚至或者以为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觉悟（确实有人私下引用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家庭的一些批判）。如前所说，这样做远不一定达到目的，而且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并没有管得那么宽，以致管到如何对待家长的一切干预这些问题。如果是私下对自己的资产阶级家长进行斗争，或可斟酌如何针锋相对的具体策略（沈父曾经是湖南省一个大专院校的干部，或许大概够得上小资了）；但是，如果要把这种斗争扩大为公开的群众斗争，那就必须考虑到佳士运动涉及的其他众多学生家长（都属于普通群众）都有同样的“好心办坏事”特点，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者更需要考虑：如何对待有落后思想的普通群众？难道要鼓励用敌我斗争方法“处决”落后群众吗？这显然是错误的，完全无助于制止落后群众的阻挠行为，反而必然引起一般群众反感。

而且，这种把两件事搅在一起的意图，即使梦雨本人是同意的，对米兔运动来说还有一个大麻烦：沈父涉嫌性骚扰这件事中真正的当事人——被骚扰的受害者，以及沈父的妻子，她们是否同意，是否有站出来、或哪怕间接站出来（比如通过中间人代为转述揭露）的意思？米兔运动的主体应该是受到骚扰侵害的人，米兔运动的呈现应该是这些人自觉自愿的呈现、或至少在 TA 们自觉支持下的间接呈现（通过中间人代为转述揭露），在这些信息缺席的情况下，突然来一篇由第三方发出的、明显有着其他当下目的的揭露文章，这就必然很快引起米兔运动活动者的疑惑。事实也是，当时声援团这篇文章发出没多久就很快遭到了众多米兔关注者的质疑。

<25>与过去的工人运动非常不同，从 2018 年广州日弘厂斗争到深圳佳士厂运动，都明显地先后突出沈梦雨、岳昕、顾佳悦、郑永明等少数几个人。由于这些个人的杰出表现和重点宣传，为运动赢得了广大的社会支持，但在佳士运动中她们几个人也首先遭到绑架、软禁，并且之后再也没有现身过。其中知名度最高的岳昕在后来至今也没有传出任何音讯，如同人间蒸发。

最后再回看，如何评价这种树立少数几个“工运明星”的策略做法？

很显然，这种高高树立少数几个标杆人物的做法（姑且简称为“工运明星化宣传策略”）不是可持续的工人运动的做法，很明显不是依靠工人阶级的集体的团结力量，而是炒作舆论造势、用突出特殊化少数积极分子、吸引社会关注和舆论影响来发挥力量。

如果说这些做法是“无奈而为之”还情有可原，因为广州日弘厂和深圳佳士厂的斗争都是在少数积极分子被资方强势开除后才走向公开化的，带有被动、无奈的性质，两个厂的少数积极分子的群众基础都分别有些不足（日弘厂相对好一点：沈梦雨得到其所在车间 50 多人网上投票支持，日弘厂共有近 200 员工；佳士厂共 1 千余人，7 名建会积极分子的建工会申请只得到 89 人签字；两个厂在后来投入实际斗争声援行动的工友分别都只有十几人）。

但如果把这些“无奈而为之”的做法拔高为一种工人运动的高明策略就完全不恰当的了。

而且，考虑到今后如果再次发生上述这种“少数积极分子被资方开除后再来维权”的情况，我们很有必要更加慎重地重新评估“工运明星化宣传策略”。这种策略确实会吸引社会公众注意工人斗争里的先进积极分子，但会有什么弊端呢？

如果说当时我们还不好说这种策略在当下中国会有什么弊端，在经历过佳士运动之后我们应该看得更加清楚了。我们这一代有责任公开指出这种策略的一个严重弊端：无论佳士运动辩解者如何自认为沈梦雨、岳昕等人只是众多左翼青年的一份子，但是从实际社会效果以及统治者暴力机器后来一系列处置措施来看，沈梦雨、岳昕等人都是站到了舆论和媒体报道的最前台、并被暴力机关认为是头号人物、首先采取强制措施和全方位的封杀。完全正如一些批评者所说，这种过度的炒作包装是在把这些积极分子放在火上烤，之前炒作包装得有多厉害，之后就被烤得多厉害。

而更严重的弊端是，对运动本身来说，这完全不是一种可持续的长期斗争策略，而分明是“决一死战”的态度；然而整个佳士运动的全部的规模 and 实际运动力度，都根本远远谈不上与庞大的天朝国家机器进行任何意义的“决战”。所以这种极力炒作包装的“工运明星化宣传策略”对任何一个社会运动来说都是根本不可持续的，严格来说属于自杀式冲锋。

此外，“工运明星化宣传策略”还有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不良影响：在当代这种策略的推手往往是更擅长舆论宣传、但并不懂得真正工运的人，而部分毛派工运人士和其他政治派系出于特定政治考虑而支持的“工运明星化宣传包装对象”也未必就懂得怎么从事工运，这就为运动本末倒置、舆论推手骑劫运动大开了方便之门。佳士运动以近乎

极端的方式证明了这个负面现象。在 2018 年 8 月 31 日网上流出的香港《亚洲周刊》两篇文章中，才刚刚从北大毕业的 22 岁学生岳昕被包装成“中国女权与工运先锋”（全文标题就是《专访：北京大学毕业生岳昕——中国女权与工运先锋》）；在专访岳昕的文章页面中间的人物档案介绍里，《亚洲周刊》称岳昕“毕业后曾到惠州电池工厂打工，被解雇后，亦参与深圳工运”，但实际上岳昕是 2018 年 6 月才刚刚结束了大学本科的学业，暑假到广东打工，实际还没做多少天，她就匆匆跑到坪山，参与了以大学毕业生和在校大学生为绝对多数的所谓佳士“工人”声援团。这种轻易的转换，混淆了媒体包装术与真正工人运动，对社会、对关注运动的进步青年、乃至对后世都产生了一种轻巧的影响——很容易让人觉得，只要勇气足够，敢于到工人中大声呐喊，尤其加上包装到位，只消在厂里打工十天半月，一个个工运明星就冉冉升起了，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左翼工人运动”就如旭日朝阳从东方喷薄而出了。

当然，上述不良影响由于佳士运动的短促和层层加码不断升级变奏而远没有来得及在当下发挥作用，但如果没有人站出来检讨这一点，难保今后有人如法炮制众人却不知其谬误，恐怕真的会有一些无知的人会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左翼工人运动的样子、只是因为统治者的打压没能实现。而我们现在要告诉诸位：如果佳士运动不吸纳左翼批评进行关键的变化，毫无阻碍地得以完全实现，那对于真正工人阶级的工人运动必然是一大隐患，因为把持佳士运动的小资精英和“明星化宣传”

推手们可以更好地包装一批不懂工运的学生和其他社会人士，然后去骑劫、争夺更大的工人运动的领导权，鼓动驱使更多工人投入盲目狂热的自杀冲锋，其劲头不亚于之前 2016-2017 年企图篡夺 WalMart 工人自组织运动领导权、狂想天开在专制极权统治下公开实行“全国三级组织架构”以拉拢工人做炮灰的黄色劳工界精英（虽然主观动机有所差别，但客观效果以及那种对真实工运一无所知、盲目狂热的劲头是完全相同的）。

D.最后的反思

<26>: 本文写作过程时，在红中网上发生了一个小论争，有网友批评某左翼“派系”/团体未对佳士运动表态，还批评一些人针对佳士运动发出“阻止更多损失就是正作用”的“止损论”。如何看待这种批评？

一般来说，当群众有组织的斗争引起左翼较多关注和讨论时，对自身政治立场负责的左翼个人及团体都应当表达自己的态度，因为这种表态也是“对自身政治立场负责”的一部分，涉及到对群众的实际影响，有实际意义。至于如何表态，形式可灵活多样，只要能让有期待的群众清楚周知即可。

从 2018 年围绕佳士运动就有一些团体或“派系”、或个人被批评未对运动表态，然而实际情况至今都是不明确的，因为：其一，这些团体或“派系”、或个人可能确实没有公开表态，但可能在私下范围内已经让其支持者了解到他们的态度了，这样说也是可行的；其二，这些团体或“派系”、或个人之所以没有公开表态，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赞成佳士运动路线的，但他们不愿在运动正当其时的时候站出来批评、或做出可能被认为泼冷水之举，这样说却也多少可以理解。

当然，也确实可能存在一些团体或“派系”、或个人在佳士运动始终并没有做出任何表态，却事后做了马后炮的“建议”或“批评”，这显然是非常错误的、投机取巧的和虚伪的做法，知情者应对其进行有充分依据的揭露和批评。而且，任何一个在 2018-2019 年对佳士运动完全缄默的左翼人士或团体，至少都没有资格自称在那些年仍坚持了对待重大现实斗争的应有政治态度；我们至少可以批评说这样的左翼人士或团体在那两年里逃避了面向群众回答对重大斗争事件的态度。

但是，如果因为某些团体或“派系”、或个人在佳士运动中私下表达过批评意见，或者因为他们更进一步做出过“阻止更多损失”的努力，就对他们这些意见和努力进行根本的否定，认为他们根本不能有那样的私下批评（或任何其他批评）、认为他们根本不能有“阻止更多损失”的努力或者不允许他们认为这种努力是一种正作用，那是完全不

合理的，是佳士运动支持者在搞“唯我独革”、妄图在运动失败后继续禁止一切批评反思。这种态度，正像本文前面第 22 问最后提到的，属于“不知耻辱，反而继续踩着运动失败后的废墟自吹自夸自我意淫，是耻辱中的耻辱，可悲至极”。

<27>如果说佳士运动是失败的、根本路线是错的且教训累累，那么如何评价这场运动的一般参与者？

这场运动对这些参与者来说是否有积极意义？

今后如何对待这场运动的参与者？

这场运动的根本路线是错的——如前所述，这是一场不顾实际人为拔苗助长地把工人维权斗争提升到政治斗争水平、力图裹挟工人大造声势的左翼政治投机冒险运动，这个情况在 2018 年 7 月底佳士运动一开始公开化时就凸显了，而如果对此看不清楚还投身其中的那些一般参与者（不包括在社团组织中担当责任的积极骨干分子），大多是不同程度的幼稚、无知、糊涂，总的来说都有着一腔理想主义热血和对实际斗争行动的渴望、在专制统治下难能可贵的行动勇气。然而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愿意承认，由于他们自己从未公开发出自己不同的批评声音，他们对这场运动的实际投入现在都化作了佳士运动投机冒险的牺牲品，不但对真正无产阶级的斗争无益，反而多多少少都为祸害进步青年和工人的“佳士运动神话”做了苦力。（至于在社团组织中担

当责任的积极骨干分子，鉴于佳士运动内部有着特别专断、僵化、极其脱离群众的官僚化组织体系[详见前述第 11、12 个问答]，他们的行为显然既不只是、或完全不是幼稚无知，也非单纯的理想热血，而不同程度从属于特定的组织行为)

我们当然不应因为佳士运动极其糟糕的一系列路线问题和极不光彩结局就否定那些一般参与者、乃至外围支持者的种种良好初衷，也并不是全盘否定佳士运动所有行动的价值(比如确实不同程度地检验和锻炼了一些个人的能力)，但更不能因为一般参与者乃至外围支持者有着种种良好的初衷或一些个人能力的锻炼，就对这场自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近几十年来最癫狂、代价罕见惨重的投机冒险运动的累累教训轻描淡写、熟视无睹。

至于这些一般参与者是否从这场失败的、根本路线错误且教训累累的运动中收获到了积极的意义，这个问题首先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承认佳士运动失败且结局悲惨的现实、然后能够从这些现实中反思总结多少教训，最终取决于他们在所有反思之后(也许是未来数年某个时候)是否还能够重拾有过的斗争经验和累累教训重返为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现场。这个问题因人而异，必然千差万别。仍有待各人去反思。

对于今后“新的历史阶段的群众斗争先进工人和左翼行动者”来说，必须彻底毫不留情地批判佳士运动支持者(尤其是潘毅)精心炮制的

关于这场运动的神话（参见“佳士运动专辑”第12个文件夹，以及网页专辑《[“佳士运动神话”首席包装大师潘毅语录](#)》），还非常有必要长期特别监督那些“曾经参加过佳士运动的相关团体及个人”，而且所有与斗争运动相关的有觉悟的群众都应该监督这些人，因为如果这些人未能从过去充分汲取教训却又投入了今后的新的运动，难免又会发生不良影响。但是这些佳士运动参与者如果能转而接受群众监督、充分汲取教训又能把过去较好的行动经验和勇气带到新的运动中来，却完全可以成为未来新运动的重要人才。